

拆除主幹，拼湊片段

——論《斐洲遊記》對於施登萊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的重構

顏健富

(新竹)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研究起點：「意譯」之外的詮釋架構

十九世紀後半葉，西方掀起探索非洲的熱潮，各地理學家、傳教士與記者等先後探入非洲，探勘彼時仍是謎團的尼羅河 (The Nile) 源頭。由於各家各執一詞，眾說紛紜，尼羅河源頭撲朔迷離，具體方位不得而知¹。六〇年代中期，立溫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1831-1873) 第三度進入非洲，探索尼羅河源頭，一度行蹤不明，引發歐美各界關注。一八六九年十月，正在西班牙馬德里的戰地記者施登萊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 接獲《紐約先驅報》 (*New York Herald*) 負責人班尼特 (James Gordon Bennett, 1795-1872) 之電報，趕至巴黎會面，受命尋找失蹤的老人：「若他還活著，就盡可能得到他在探險中的消息。若他已死亡，就將所有可能證明他已死亡的證據帶回來。」² 經隊友背叛、熱病侵襲到戰爭失利，終於一八七一年十月抵達烏齊齊 (Ujiji)，尋得病體衰弱的立溫斯敦。施

¹ Henry M. Stanley, "Explanation (part II)," in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London: George Newnes, 1899), pp. 7-21.

² Henry M. Stanley, "Introductory," in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Travels, 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 Including an Account of Four Months' Residence with Dr. Livingston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2), p. xvii. 引文係筆者所逕譯。

登萊而後返回歐美，出版《我如何尋找立溫斯敦》(*How I Found Livingstone*)，一舉成名。留在非洲的立溫斯敦繼續探索尼羅河，然一直到一八七三年過世，都無法解開迷團。一八七四年，施登萊又再度前往非洲探索立溫斯敦未能解決的問題，探索博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史畢克(John Hanning Speke, 1827-1864)與立溫斯敦假設的尼羅河源頭，最終證實史畢克之觀點，一八八八年寫出《穿越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十九世紀七、八〇年代，隨著新媒體的發展與傳播，晚清中國文化界也捲入全球訊息流動的一環，開始報導立溫斯敦與施登萊等人到非洲冒險與探勘的活動。不僅於活動報導，晚清作者亦翻譯歐美人士的非洲傳記，如一八七九年，由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的《黑蠻風土記》，乃是翻譯立溫斯敦出版於一八五七年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相隔四年後的一八八三年，《益聞錄》連載《三洲遊記》(1900年結集出版時易名《斐洲遊記》)，由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1850-1931)「筆述」的《三洲遊記》，乃是翻譯施登萊 *How I Found Livingstone*。這兩部著作成爲中國最早的非洲探險譯本，勾勒非洲內陸的歷史地理與風土民俗。可惜往後百年，相關資料隱而不彰，致使研究者一般較易聚焦於晚清的歐、美、日書寫，相對忽略彼時人士開拓「非洲」新天地的意圖。

本文重新觀察晚清各種資料，系統性揭開此一資料的發生，並且評估其出現的意義。本文首先考掘《斐洲遊記》的發生脈絡，觀察此一具有突破性題材的著作爲何會出現於晚清報刊？同時，透過大量的原始資料，釐清譯者身分與該譯著隨後衍生的多種版本，唯有解決這些看似最基本可是卻最棘手的問題後，才能拓展各種延伸性研究。接而，本文透過翻譯研究的視角，提出「拆除主幹，拼湊片段」的理論視野，試圖推進學界普遍提出的「意譯」模式³。由於《斐洲遊記》遠超出一般可以辨識來龍去脈的「意譯」著作。本文試圖提出另一更有效的詮釋架構，觀察此一出現於十九世紀八〇年代的譯著如何拆除原著主幹，接而又拼湊

³ 論者早已指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譯著普遍出現的「意譯」特色，如「對內容的隨意刪改」、「直接介入譯文以發表自己的評論」、「更改故事的敘述方式」、「譯意不譯辭」、「把西洋小說改變爲章回小說」與「刪去無關緊要的閑文和不合國情的情節」等。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3-39；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年—1916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6。

不同脈絡的片段。從「拆除主幹」的視角，探討譯者如何重構敘述者的視角，演述施登萊的非洲風土，經由刪除／保留原文的方式，拆除原著「尋找尼羅河」的主幹，同時又透過保留地方風土民俗的方式，凸顯「採風問俗」，造成主旨的變調；第三，從「拼湊片段」的角度觀察譯者如何調動各種知識資源與文學傳統，進出中西古今，打破歷時性與同時性的關係，牽動表述的慣性，反映譯者對於抒情、知識與敘事的追求；最後，本文觀察《斐洲遊記》「拆除主幹，拼湊片段」，層層錯疊不同脈絡的片段內容，以致百年以降的論者難以判斷譯本來源，蔚為特殊的接受視野。

二、譯本的發生：從《三洲遊記》到《斐洲遊記》

十九世紀的中國人重構新一多元結構的世界觀與體系，從過去上下等級關係 (Interclass Relation) 轉向國與國的對等關係 (Interstate Relations)。自林則徐 (1785-1850)、徐繼畲 (1795-1873)、魏源 (1794-1856) 等人編寫《四洲志》、《瀛環志略》、《海國圖志》，到六〇年代隨著使外人員、商紳、學生的海外記載，介紹各國史地、文化、風土、建築、法律、兵法與天文等，開啓「世界」的櫥窗。本節將討論《斐洲遊記》為何／如何出現於此脈絡的意義，並且釐清譯本出版、譯者身分與各版本差異，為隨後數節的討論奠下基石。

十九世紀後半葉，各種新興媒體於上海誕生，如傳教士辦理的《六合叢談》(1857年創辦)、《教會新報》(1868年創辦，1874年改為《萬國公報》)等，英商創辦的《上海新報》(1861年創辦)、《申報》(1872年創辦)等，大量刊登新聞、西學、傳教、新聞、貿易與論說等，呈現一國際視野，逐漸形塑一瞻望世界的窗口。來自不同地區的文人來到上海，投入此由新聞、出版社與印刷結為一爐的新興媒體，「從事文藝產品生產和經營活動的文人，是中國第一代職業作家」⁴，反映近現代文人的現代化轉型。一八五七年，王韜 (1828-1897) 在上海墨海書館投入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編輯的《六合叢談》，接觸各種人文科學、自然科學與宗教等知識。隨後，各文人圍繞著不同報館，如《申報》的文人何桂笙 (1841-1894)、錢昕伯 (1832-?)，《新報》的袁祖志 (1827-1898) 與《益聞錄》的鄒弢 (1850-1931) 等。這批文人／報人

⁴ 孟兆臣：《中國近代小報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19。

群體，固然擅長舊式文人的吟風賞月、舞文弄墨，可是處於華洋夾雜的城市，大量接觸西洋資訊與現代文明，撰文介紹中西體制，甚至透過傳統詩詞描寫上海洋場，描繪外國洋房、火輪船、馬車、花園、跑馬、戲館、拍照、自來火燈、東西洋女、自鳴鐘與電線等。

文人除在紙上構築域外文明，亦有機會體驗海外生活，如王韜於一八六七年受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之邀，從香港出發前往蘇格蘭，遊逛歐洲數國。一八八三年，袁祖志隨著上海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 (1832-1892)，前往歐洲各國考察招商局業務十個月，考察十一國。他們的海外遊記接而又由新興媒體刊登傳播，如《申報》於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陸續刊登袁祖志的海外見聞、隸屬於《申報》的《點石齋畫報》自一二七期 (1887.10) 刊登到一七七期 (1889.2) 刊登王韜的《漫遊隨錄》⁵，開拓文人／報人群體透過媒體技術塑造新世界觀的公共輿論與文化形態。若又加上彼時上海報刊刊登出使官員的海外遊記，如《教會新報》第一三五卷 (1871.5.20) 至一五四卷 (1871.9.23) 連載斌椿的《乘槎筆記》，《萬國公報》第五二一期 (1879.1.4) 至五二二期 (1879.1.11) 刊登何如璋 (1838-1892) 《使東雜詠》，可見到新興媒體所掀開的世界櫥窗，已非傳統遊記格局所能概括，展現各大洲的航行路線、方位、經緯、天候、風土、民俗與政經等，勾勒嶄新的世界體系。

在「面向世界」的思潮中，以往相對受到忽略的「非洲」，逐漸進入時人的眼簾。雖然，中國人的足跡尚難探入非洲內陸，可是隨著電訊傳播的發展，歐美人士探勘非洲內陸的訊息，傳播到中國。一八六六年七月，大西洋電報纜線 (The Atlantic Cable) 之竣工，原本輪船傳送大西洋兩岸訊息需費十日，大幅度縮短十數小時⁶，掀起十九世紀訊息全球化的浪潮。晚清中國文化界也捲入全球訊息流動的一環，開始報導各冒險者到非洲內陸探勘的活動，必不會錯過喧騰於七〇年代的新聞事件：美國戰地記者施登萊探入非洲，於烏齊齊一帶尋得下落不明的英國傳教士立溫斯敦，讓施登萊在鎂光燈聚焦下，成為最受矚目的探險者。一八七四年，施登萊又再次進入非洲探索尼羅河之源頭，解決過去數十年未能克服的地理謎團，凱旋而歸。施登萊三番兩次探勘非洲的消息，輾轉傳播到中

⁵ 本文正文所論及之雜誌，為節篇幅，出版日期之年、月、日，僅於期數之後於括號內，分別以阿拉伯字表示之。

⁶ Arthur Wilson, *The Living Rock: The Story of Metals since Earliest Times and Their Impact o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Woodhead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 203.

國，從使外人員到文化人士都有所敘述⁷。於此新聞焦點中，一八八三年，《益聞錄》連載施登萊的《穿越黑暗大陸》，呼應的是晚清報刊方興未艾的海外遊記熱潮。

不同的是：《斐洲遊記》涉及彼時中國人尚無法探入的非洲內陸⁸，揭開歐美地理學界正在探索的非洲內陸。《益聞錄》為何會翻譯連載一部如此具有超前意識的「非洲」「遊記」？無論是規模或影響力，《益聞錄》遠未及《教會新報》、《上海新報》與《申報》等。若是觀察《益聞錄》的編輯群體與方針，實有跡可尋。一八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位於上海徐家匯的《益聞錄》報館正式出版，原是半月刊，半年後「定每七日一次」，第一五〇號後改為每七日出版兩次，視野開闊，開闢「五洲雜俎」、「時事匯登」與「海外通訊」等專欄，提供歐、美、亞、非、澳洲之歷史、地理、科學、人文等時事訊息⁹。從報刊的自我命名，即可察及編者以「益聞」作為第一要務的自覺：「讀是書者，益於性命，益於邦家，推之萬事萬理，無不於此大有賴焉，故是錄之名以益聞者。」¹⁰《益聞錄》由司鐸李杕(1840-1911)擔任主筆，集結一批對於歷史、地理學有高度專業力的編輯如龔柴(?-1914)、許彬與徐勵等人，透過系統性的分工，介紹世界各地地理學，如龔柴與徐勵負責亞、歐兩洲，許彬則是負責非、美洲¹¹。《益聞錄》自創刊號便陸續刊載〈地體渾圓說〉、〈地體渾圓難辨〉與〈地球

⁷ 如王韜〈探地記〉指出施登萊與立溫斯敦相遇，「把臂歡然，恨相見晚」；郭嵩燾提及施登萊一八七四年到非洲探險，「起自阿非利加之東曰桑希巴爾，經西出鋼戈江」。分別見：〔清〕王韜：〈探地記〉，收入〔清〕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第12帙，頁11b；〔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1輯，第6冊，頁339。

⁸ 晚清人士前往非洲者，大多停留於埃及沿海大城，如一八四一年回教徒馬德新曾到麥加朝聖，於開羅居住半年。一八五九年郭連城由海路直達蘇伊士，再由蘇伊士坐火車經開羅至亞歷山大。一八六六年，清廷派出斌椿使團出訪歐美，途經北非，隨團成員張德彝記錄非洲金字塔。

⁹ 〔清〕佚名：〈益聞錄弁言〉，《益聞錄》第1號（1879年3月16日），頁1。該文未標出作者之名，應是《益聞錄》創辦人李杕。其於文中書寫：「故是錄始以諭旨，示尊王也；終以地輿、天文、算數諸說，崇實學也；其間附以道學論、時事論，暨一切新聞、傳紀、文啓、詩詞等作，分爲數種」。

¹⁰ 同前註。

¹¹ 〔清〕李杕：〈序〉，收入龔柴：《五洲圖考》（上海：徐家匯印書館，1898年），頁3a-b。〈序〉中提及：「龔君古愚考亞、歐二洲，登諸報牘。內如干章爲徐君伯愚手筆，其勞亦不可沒焉。厥後許君采白考非、墨、澳三洲事蹟。既竣，重行校正，次第付梓」。

形勢說》等介紹地球與五大洲分布的文章，第六號(1879.6.1)刊出〈亞西亞洲〔亞洲〕總論〉，前一百期系統介紹中國各省分，一百期後延伸到世界各國考略與地圖，如第一〇三號(1881.6.4)刊登〈朝鮮全圖〉、第一〇七號(1881.7.2)〈越南暹羅緬甸合圖〉、一二八號(1881.11.26)〈波斯阿剌伯合圖〉、一五四號(1882.5.17)〈歐羅巴全圖〉、三〇五號(1883.11.7)〈北亞墨里加全圖〉、三一四號(1883.12.8)〈南亞墨里加全圖〉、三六九號(1884.6.25)〈亞斐利加全圖〉、三八一號(1884.8.6)〈亞斐利加中西北境合圖〉、第四二五號(1885.1.7)〈澳削尼亞全圖〉，循序漸進，從中國探向亞洲、歐洲、美洲、非洲與澳洲，當中穿插主題性文章如二六二(1883.6.9)、二六四號(1883.6.16)〈天下高山題名〉、〈天下大川題名〉等。

相比起其他報刊，《益聞錄》在「非洲」的報導路線上，走得更遠，尤其是第三〇〇號(1883.10.20)後日益增加，如〈亞斐利加洲總論〉(第369[1884.6.25]、373[1884.7.9]、375[1884.7.16]、377[1884.7.23]、379[1884.7.30]、381[1884.8.6]號)、〈亞斐利加南境考畧〉(第418號[1884.12.13])、〈亞斐利加東境考畧〉(第421號[1884.12.24])等。作為積極關注非洲的報刊，一八八三年《益聞錄》二七八號刊登一篇具有序言作用的短文〈三洲遊記小引〉(下稱〈小引〉)，預告報館即將連載《三洲遊記》：

本館近得西文《三洲筆記》一書，芸憲撥冗，披閱一周，覺書中所載人物、風土之奇，莫名一狀，因不揣固陋，譯著是編，名曰「三洲遊記」。¹²

刊登〈小引〉後，《益聞錄》隨即於下一期的二七九號(1883.8.8)至第七三六號(1888.2.1)連載《三洲遊記》(見圖一)，替晚清的「世界」櫥窗開啓不同的風景，恰能反映該報館日益關注「非洲」的趨勢。不過，《益聞錄》連載該譯著時，始終未提及原著與譯者之名¹³，導致接而數年各種版本始終出處未明。一直要到一九〇〇年結集出版，改名《斐洲遊記》時，才指出口述者是「虛白齋主」，筆述者「鄒弢」。

¹² [清]佚名：〈三洲遊記小引〉，《益聞錄》第278號(1883年8月4日)，頁353。

¹³ 《三洲遊記》連載期間，作者欄大多是空白，《益聞錄》第二八〇號(1883.8.11)卻出現「丁雪田」之落款(頁365)，實是虛托譯文中的人物之名。

成的篇數抄錄龔柴的文章¹⁶，即可見到他在同輩人心中的份量。

爲何此一由龔柴口述的譯稿會交給鄒翰飛「筆述」呢？綜觀《益聞錄》的編輯陣容，鄒翰飛是不二人選。鄒翰飛乃是上述的鄒弢，號瘦鶴詞人、酒丐，無錫人，一八八一年自蘇州來到上海，投入《益聞錄》編務¹⁷。鄒弢具有地理學背景，其編撰的《萬國近政考略》，收錄〈天文考〉、〈地輿考〉、〈沿革考〉、〈風俗考〉、〈軍政考〉、〈教派考〉、〈雜考〉與〈列國編年紀要〉等內容¹⁸。他同時又擅長各種文類，從《斷腸碑》（又名《海上塵天影》）到詩、詞、駢文創作，一如比他更早之前來到上海的王韜與袁祖志等前輩，展現文人兼報人的跨文化視野。不同的是：鄒弢始終未能如王韜與袁祖志般遊逛海外，只能透過撰寫文章，傾訴其對於海外世界的憧憬與嚮往，如同〈小引〉一文指出譯本爲彌補「好遊之士」無法遠遊之憾，透過「讀此書」而「以目耕爲身歷」¹⁹。

《益聞錄》以「三洲遊記」作爲譯著題名，顯然，「三洲」無法對應施登萊原著的「非洲」。根據〈小引〉指出：「三洲者，亞非利加、亞美利加及歐羅巴洲也。其中除人名、時日，舉皆借托外，餘俱實事求是，不尙子慮。」²⁰〈小引〉解釋「三洲」是非洲、美洲與歐洲，跟聚焦於「非洲」的施登萊原著相去甚遠，實反映譯者如何乘著施登萊的船艦航向晚清文人的海域。該譯著正處於歐美遊記興起的年代，如志剛於一八六七年隨同蒲安臣(1820-1870)使節團，訪歐美各國，後寫成《初使泰西記》；一八六七年，張德彝(1847-1918)第二度出訪海

¹⁶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前三冊分別收錄十九、十、十四篇（卷）地理學文章，共四十三篇（卷），其中抄錄龔柴的文章分別是七、八、十二篇（卷），共二十七篇（卷）。《小方壺齋抄錄龔柴的文章如下：第一冊收〈地球形勢說〉、〈地理形勢考〉、〈五洲方域考〉、〈中國方域考〉、〈中國形勢考略〉、〈中國歷代都邑考〉、〈中國物產考略〉；第二冊收〈滿洲考略〉、〈盛京考略〉、〈直隸考略〉、〈江蘇考略〉、〈安徽考略〉、〈江西考略〉、〈浙江考略〉、〈福建考略〉；第三冊收〈湖北考略〉、〈湖南考略〉、〈河南考略〉、〈山東考略〉、〈山西考略〉、〈陝西考略〉、〈甘肅考略〉、〈四川考略〉、〈廣東考略〉、〈廣西考略〉、〈雲南考略〉、〈貴州考略〉。

¹⁷ 在梁溪瀟湘館侍者《春江花史》卷一〈陳玉卿〉中載：「辛巳秋余始來滬上，主益報館筆政。」見〔清〕梁溪瀟湘館侍者輯：《春江花史》（上海：二石軒，1884年），頁1-2。

¹⁸ 關於鄒弢的生平傳記與資料，可見錢琬薇〈中國近代報人——鄒弢其人其書〉一文，有詳細的爬梳。見錢琬薇：《失落與緬懷：鄒弢及其《海上塵天影》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30-73。

¹⁹ 佚名：〈三洲遊記小引〉，頁353。

²⁰ 同前註。

外，訪美、英、法，後寫成《再述奇》（又名《歐美環遊記》）；一八七六年，李圭（1842-1903）參加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經日本東渡太平洋到美國費城，又乘船到倫敦，遊覽英國、法國，最後經地中海、印度洋歸國，後寫成《環遊地球新錄》。一八八三年，袁祖志跟隨唐廷樞考察團，從西貢開始，經過新加坡、錫蘭、亞丁、義大利的拿波利、羅馬，進入歐陸巴黎、倫敦、柏林、荷蘭、西班牙馬德里，回程則途經美洲，甚至延伸到巴西，後寫成《談瀛錄》。譯者受到同代人路線的啓發/限制，加入施登萊原著所無的歐、美兩大洲。

作為彼時罕見的非洲材料，即或是《三洲遊記》在翻譯上未必忠實於原著，可是卻因其題材上的突破與罕見性，而屢受關注，多次獲得（再）抄錄、整理與出版的機會，使得該譯著出現不同的版本。一八九一年，當王錫祺編輯「凡涉輿地，備極搜羅」²¹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其中第十二帙設立「非洲」主題，收錄《三洲遊記》（見圖二）。雖然，王錫祺常因擅自刪除原著內容而備受批評，可是若就《三洲遊記》而言，卻是相當節制，尤其是有關客觀描述非洲的部分，皆如實抄錄，幾無增減。不過，針對譯著過於文人化的片段或是明顯杜撰的部分，王錫祺雖未能核對施登萊原著，卻有所察覺，做出以下調整：(1) 刪除《益聞錄》譯者自行加入的中國詩詞與書信內容，如《益聞錄》第二八一號餞別友人之詩詞、三一三號丁雪田寫給中國親友的家書、三五〇號首客途詩詞、五五三號中國友人的墓碑內容與悼文、六一三、六一八號湖南岳洲口技表演²²；(2) 修正日期重疊的問題，如《益聞錄》三一九號「四月十二日，陰，風逆難行」，後接「十三日，午後，抵罷迦毛埠」，與後文又出現的「十三日」重疊，《小方壺齋》將上述的十二、三日內容調為同一天，解決日期重疊的問題²³；(3) 調整部分中國時序，如將《益聞錄》三五〇號「中秋日，晴，微有秋涼」改為「十五日，晴，微有秋涼」²⁴；(4) 取消人物落款：《益聞錄》二八〇號，文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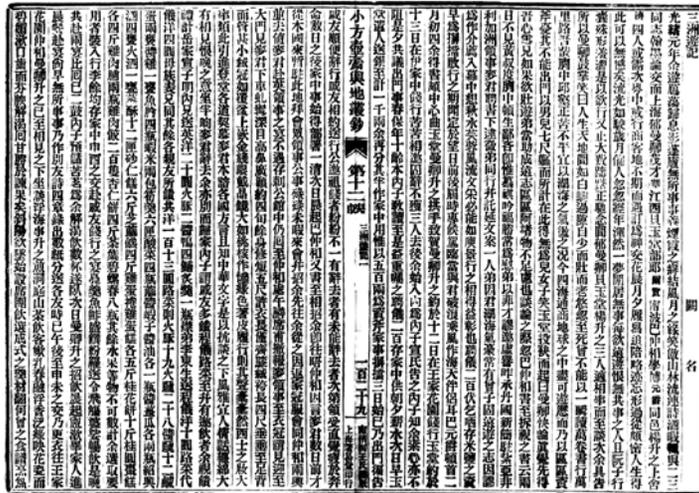
²¹ 王錫祺：〈序〉，《小方壺齋輿地叢抄》，第1帙，頁1a。

²² [清]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第281號（1883年8月15日），頁371；第313號（1883年12月5日），頁564；第350號（1884年4月19日），頁178；第553號（1886年4月21日），頁178；第613號（1886年11月17日），頁533；第618號（1886年12月4日），頁562。

²³ 同前註，《益聞錄》第319號（1883年12月26日），頁599；王錫祺編：《三洲遊記·九》，《小方壺齋輿地叢抄》，第12帙，頁137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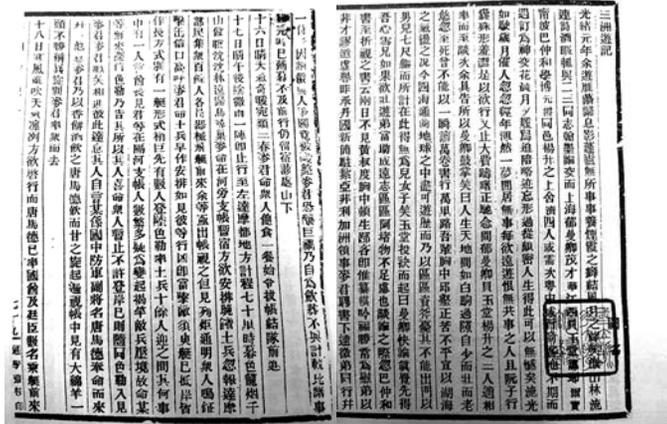
²⁴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第350號，頁178。王錫祺編：《三洲遊記》，第12帙，頁146b。

落款署名「番禺丁雪田記」、三一三號丁雪田寫一封寫給上海友人之信附上「丁廉、巴元爵同頓首」之落款²⁵，淡化《益聞錄》版本的文人色彩與譯者烙印。



圖二、《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錄《三洲遊記》

一八九九年，當鄒凌沅（?-?）編《通學齋叢書》（見圖三）。「通學」乃是為彰顯「中西學術融會貫通之意」，輯錄於此系列的「通學」之書主要是彰顯中西學術的譯著，收錄《格致答問類編》、《列國編年紀要》、《泰西河



圖三、《通學齋叢書》收錄《三洲遊記》

²⁵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三洲遊記》，《益聞錄》280號，頁365、第313號，頁564。

防》、《歐州新志》與《天演論》等。該叢書第二十八、二十九冊收錄《三洲遊記》，反映編者擴大「中西」的意圖，將視野延伸到非洲版圖。鄒凌沅遵循《小方壺齋》版本，刪除詩文、修正日記矛盾，凸顯非洲地理學、降低文人色彩。雖然，《小方壺齋》與《通學齋》版本看似糾正《益聞錄》謬誤，可是兩者都未能閱讀或是核對施登萊原著，至多只是隔靴搔癢，未能大刀闊斧修正譯著與原著的差異之處（詳見第三、四節），也未能補充仍然處於謎團狀態的出版訊息。

一直要到一九〇〇年，由《匯報》館編輯，上海中西書室結集出版《斐洲遊記》（見圖四）時，才跨出更大一步。《匯報》館乃是《益聞錄》的原班人馬，創刊於一八七九年的《益聞錄》於一八九八年與《格致新報》合併，易名《格致益聞彙報》，每週刊出兩期，自第一〇〇號後改為《匯報》。當《益聞錄》原班人馬出版該譯本單行本時，更能掌控施登萊原著的脈絡，明確指出施登萊著作，由虛白齋主口述，鄒翰飛筆述，揭開出處之謎。口述者虛白齋主特地替此一單行本寫〈序〉：

《斐洲遊記》，施登萊作也。施，英人，精地理，有遠大志，但以遊歷天下為懷。光緒初葉，應倫敦地學會聘，携巨貲，糾同志數人，招黑蠻二百餘，多載槍械布帛，為御灾市食之謀，裝錄束已。自斐洲東境散齊巴發駕，直入中央，全貫腹地，皆歐人所未嘗至，而他國亦未有往者。首尾二、三稔，危機頻觸，艱困備嘗，與土人戰者屢，為飢寒傷者亦屢，遂致同志亡其半，而黑蠻亦病斃頗稠。然其間風土人情，山川物產，施以畫圖貼說，手錄成編，比歸付梨棗，呈之政府，散之各方，一時傳徧歐洲，膾炙人口。自是西人之往斐者踵相接，商賈于以通，舟車于以達，近已析其地，化其民，聲教蒸蒸日上。溯厥由來，施之功多且偉也。某嘗閱其記，見怪怪奇奇，良堪悅目，因逐漸口譯，浼鄒君翰飛，筆錄而潤色之，列入《益聞錄》，閱一年始竟。編中有麥領事、巴仲和等，俱假借之詞，蓋恐直陳無飾，讀者易於生厭，故為此演說之文，以新眼界。若夫所述事蹟，則言言從，寔未失廬山真面，世之作臥遊計者，此亦一助也。光緒二十六年夏，徐滙虛白齋主謹識。²⁶

²⁶ 虛白齋主：〈斐洲遊記序〉，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上海：上海中西書室，1900年），卷1，頁1a-b。



圖四、《斐洲遊記》內頁書影（左），內文標註作者為「施登萊」（右）

相比起一八八三年為連載《三洲遊記》而寫的〈小引〉模糊提及「本館近得西文《三洲筆記》一書」，一九〇〇年配合《斐洲遊記》集子出版而寫的〈序〉，更能反映原著的出處與內容，大致釐清譯著出處、譯者身分與翻譯策略等。首先，〈序〉文將原本的「三洲」題名改為「斐洲」，更能符合施登萊原著聚焦描寫「非洲」實況，解除一八八三年「三洲」題名的窘境；其次，〈序〉中明確指出原著作者是「施登萊」、口譯者是「虛白齋主」，筆錄者是「鄒翰飛」，不再以「闕名」處理，且附上施登萊肖像（見圖五），可見其對於原作者資料的掌控；第三，從評論的角度分析原著的梗概結構：「首尾二三稔，危機頻觸，艱困備嘗，與土人戰者屢，為飢寒逼者亦屢」；第四，談及原著出版後的影響，如「西人之往斐者踵相接」、「析其地，化其民，聲教蒸蒸日上」，雖不乏西方傳教士的「教化」視角，仍能反映大致實況；第五，指出譯本的翻譯策略與動機，如「麥領事、巴仲和等，俱假借之詞，蓋恐直陳無飾，讀者易於生厭，故為此演說之文，以新眼界。」



圖五、施登萊肖像

從〈小引〉到〈序〉的演進，大致可以推敲：一八八三年，「閱一年始竟」的虛白齋主尙未能完全掌控原著，一直要等到十七年後，《匯報》館結集成書時，才清楚道出原著梗概、作者身分、著作內容與翻譯動機等，替原本訊息不明的《三洲遊記》奠定輪廓。固然，《斐洲遊記》比起《小方壺齋》與《通學齋》等版本更能提供精準的訊息，且修訂更接近於原著的題名，卻因未能同步修訂一八八三年譯本杜撰的內容——中國人物隨著西方冒險家從中國到香港、越南、新加坡、錫蘭再到非洲的經歷，遂使得「斐洲」題名與譯文內容出現更大的鴻溝。站在後見之明的位置，或可揣測：虛白齋主面向一八八三年翻譯的《三洲遊記》時，由於偏離原著太多，牽一髮而動全身，較難修正內文，只能避重就輕，更改題名後補上一篇序文，替一八八三年訊息不明的〈小引〉補上出處資料，可是卻未能修正正文的各種失誤之處。同時，序文也出現若干基本訊息之失誤，如指施登萊「應倫敦地學會聘」，實為英國《每日電訊報》與美國《紐約先驅報》，如郭嵩濤出使日記所記載：「倫敦《特力格訥弗》新報局與美國紐約之《赫拉爾得》新報局遣人探阿非利加中土。」²⁷

從上可見，一八八三年《益聞錄》因其編輯群屬性，而翻譯連載一部在地理學具有超前意識的《三洲遊記》，反映上海文人／報人在新興媒體提倡海外遊記的脈絡上，更進一步開啓「世界」櫥窗的意圖。短短十餘年，該譯著多次獲得重新抄錄出版的機會，可是卻因編者未能確切核對原著而出現若干侷限，且始終未能解開譯者身分與原著出處。一直到一九〇〇年，《匯報》館結集出版《斐洲遊記》時，察覺題目上的謬誤，將《三洲遊記》改為《斐洲遊記》，並且解開懸擱多年的出處之謎。

三、拆除主幹：虛構人物，演述非洲

《斐洲遊記》出現諸多改編之處。譯者帶著屬於自身脈絡的眼光、語氣與思考，彰顯不同於原著的觀看非洲的方式。本節將討論譯者如何介入施登萊原著，虛構原著所無的中國人物，重構敘述視角，演述非洲風土民俗，使得整篇譯著浮現中國人物的聲音、渴望與審美等？譯者如何循著自身的旨趣，選擇性保留／刪除特定內容，造成原著主旨的轉調？

²⁷ 郭嵩濤：《倫敦與巴黎日記》，頁 339。

譯者大幅度調動原著內容，如對原著主人翁「施登萊」進行調整，將其名字中國化，易名「麥西登」，刪除 Stanley 之“ley”，加入麥姓，「西登」則是“Stan”之音譯，乃是彼時常見的西人中國化的譯法²⁸。譯著接而虛構情節，安排麥西登探入非洲前，取道中國，迎接原著所無的中國文人——丁雪田與巴仲和，讓中國人物捲入非洲內陸的探勘活動，反映的是人物「面向世界」的渴望，填補彼時中國人士尚未有機會探入非洲內陸的缺憾。更激烈的轉變是：譯者將施登萊第一人稱視角改為丁雪田，隨著其視角觀看非洲，浮現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譯者面向非洲時的核心關注。一旦譯者以丁雪田視角為中心，必然流露中國人特有的視野、品味與慣性，遠不同於施登萊觀看非洲的視角。為配合此一虛構的人物身分，譯者採光緒紀年，且以中國作為行程的起點：丁雪田等人自光緒二年二月十六日從中國出發，「十九清早，始抵西貢」，「二十三日巳正」抵新加坡，「四月初二日，風大順，日可行三百里，晚刻舟抵散西巴爾泊焉」，探入非洲內陸，光緒四年六月抵達烏齊齊，一直到同年十月「徑赴任所」²⁹。相形之下，施登萊從美國出發，途中停留英國，迎接英國助手，一八八四年九月進入非洲散西巴爾。譯著由於加入中國、西貢與新加坡等行程，導致接下來的時間錯亂，甚至自相矛盾，如人物自光緒二年二月出發，到年底「冬冬臘鼓，歲已催殘」³⁰時，理應發展到光緒三年正月，卻接到「光緒四年正月元旦」³¹。譯者又替此一敘述人物注入符合其文人身分的詩詞，如「作別友詩四章」之詩詞、「途中口占云」多首詩詞³²。

比起直接翻譯施登萊視角中的非洲，譯者為何透過虛構中國人物的視角，重新演述非洲內容？此牽引出中西語境對於非洲地理學迥然不同的核心關懷。從一八二一年巴黎地理學會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一八三〇年皇家地理學會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一八四五年俄羅斯地理學會 (The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到一八八八年成立的國家地理學會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促成西方不同的探險隊伍，帶著精密的探測儀器，結合科學、地理、

²⁸ 此如樽本照雄稱此一譯著「改成遊記小說體裁，書中人名也都改成中國風人名」。樽本照雄編，賀偉譯：《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頁158。

²⁹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1，頁5b、8a、15a；卷4，頁50b-51a。

³⁰ 同前註，卷3，頁13b。

³¹ 同前註，卷3，頁14a。

³² 同前註，卷1，頁1b、19a；卷2，17b；卷3，頁2a；卷2，頁17b、17a。

政治、宗教與殖民等動機，開啓一場「發現非洲」乃至「瓜分非洲」的競技。施登萊探向彼時各探險團最津津樂道的話題——尼羅河的源頭何在？各探險隊伍窮盡畢生精力，繳交不同的答案，如博頓指出坦噶尼喀湖 (Lake Tanganyika)、史畢克提出維多利亞湖 (Lake Victoria)、巴克 (Samuel Baker) 宣稱艾伯特湖 (Lake Albert)、立溫斯敦推測盧拉巴河 (Lualaba River)。莫衷一是的判斷，導致尼羅河源頭成爲一道衆人關注可是卻無法解答的謎題。施登萊原著回應的是西方探勘者積累多時可是尙未能解決的地理學議題，箇中盤根錯節，脈絡複雜，如他指出：「我現在計畫描述如何解決博頓與史畢克、史畢克與葛蘭特 (James Augustus Grant)，與立溫斯敦博士等人未能完成的探索工作。」³³ 施登萊自非洲東部海岸散西巴爾探入，抵達東非湖區，遊歷維多利亞湖，證實探險家史畢克的觀點，接而又探勘艾伯特湖與坦噶尼喀湖，證實相關水域與尼羅河無關。最後，他向西探勘立溫斯敦主張的盧拉巴河，查得該河屬於剛果河，而非尼羅河，解決過去爭議不休的地理學議題。

顯然，中國譯者缺乏施登萊脈絡的非洲地理根基，無法釐清錯綜複雜的尼羅河源頭的問題。「尋找尼羅河源頭」此一議題，展現歐美地理學家持之以恆的專業對話與學理判分，非晚清譯者所能深入掌控。譯者有意無意錯失施登萊原著「完成由立溫斯敦博士遺憾未完成的工作，盡可能解決中非地理問題」的主旨³⁴，轉向更具普遍視角的「風土民俗」。施登萊《穿越黑暗大陸》記錄自身從非洲東海岸探入非洲探勘尼羅河源頭的過程。譯者卻將施登萊探勘尼羅河的身分，改爲赴亞德拉埠接任領事，途中接觸各地風土民俗，使得「尋找尼羅河源頭」的原著主旨，轉向更能呼應中國人的旨趣。若是觀察此一譯著於一八八三年連載與一九〇〇結集出版時所寫的兩篇序言，可清楚見到譯者的意圖。一八八三年，《益聞錄》〈小引〉一文中提及「覺書中所載人物、風土之奇，莫名一狀」³⁵，絕口不提「尋找尼羅河」一事，反而彰顯「風土之奇」，譯著內容亦指

³³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I, p. 21.

³⁴ Henry M. Stanley, "Explanation," in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p. 3: "The purpose of the enterprise," it said, "is to complete the work left unfinished by the lamented death of Dr. Livingstone; to solve, if possible, the remaining problems of the geography of Central Africa; and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upon the haunts of the slave traders" ... "He will represent the two nations whose common interest in the regeneration of Africa was so well illustrated when the lost English explorer was rediscovered by the energetic American correspondent."

³⁵ 佚名：〈三洲遊記小引〉，《益聞錄》第 278 號，頁 353。

出眾人「往亞斐洲內地，問俗採風，以資治理，并為後日通商地步……由內地繞行，前赴新任」³⁶。一九〇〇年，當虛白齋主替《斐洲遊記》結集出版寫〈序〉時，更進一步凸顯「採風問俗」之主旨：

自斐洲東境散齊巴發駕，直入中央，全貫腹地，皆歐人所未嘗至……其間風土人情，山川物產，施以畫圖貼說，手錄成編，比歸付梨棗，呈之政府，散之各方，一時傳徧歐洲，膾炙人口。³⁷

無論是從《三洲遊記》或《斐洲遊記》之〈小引〉或〈序〉，都未提及尼羅河源頭，卻強調「風土之奇，莫名一狀」、「風土人情，山川物產」、「問俗採風，以資治理」。

在「採風問俗」的旨趣下，譯者透過丁雪田視角，重新演述原著內容，娓娓道出各地民俗、服飾、信仰、農耕與制度等。尼羅河片段遭到刪除，地方風土則受到保留，此消彼長，使得原本統攝於「尋找尼羅河源頭」主線下的「風土民俗」，反客為主，變為譯著主旨。虛構人物的視角，固然擴大譯著與原著的鴻溝，可是卻更能自由自在地穿梭於原著脈絡，擷取符合自身脈絡的內容。若是按照〈斐洲遊記序〉說法：「恐直陳無飾，讀者易於生厭，故為此演說之文，以新眼界」。譯者因擔心直接翻譯，過於枯燥，改由丁雪田「演說」非洲。此一「演說之文」浮現中國敘述者的聲音、審美與考量，以下分成幾節闡述。

（一）以中國讀者為對象

譯者虛構丁雪田此一人物的敘述視角時，經常隱藏著以中國讀者為對象的預設，按照其不熟悉的風土民俗，主動補述或闡述，讓讀者更易掌握原著的非洲內容。如譯者安排丁雪田演述施登萊等人抵達散西巴爾之片段：

按散西巴爾，亦名桑給巴爾，在亞斐利加東境，為彈丸小島，得四萬一千九百八十四方里。自印度錫蘭南埠本德加城西南行，洋面約四十度有奇，計七千三百餘里。其地天氣炎酷，常如初夏，土地荒涼，人民稀少。惟桑給巴城設有商埠，濱海數十里皆種樹木，蔭地參天，綠陰如幄，所產五穀甚豐饒，更盛產芭蕉，一望皆是。土人面黑如漆，亦有黃瘦如菊者，多衣白色長衣，莠水性。民間船隻如中國划子式，江船多用雙槳，舟子皆

³⁶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1，頁16a。

³⁷ 同前註，卷1，頁1a-b。

衣白，衣腰纏紅巾，別有一般裝束。³⁸

核對原著，施登萊描寫自己返回闊別二十八個月的散西巴爾時，見到「棕櫚樹與芒果樹在熱氣蒸騰中搖曳」、汽船「經過桑吉巴爾與大陸隔開的海峽」，感受到「悶熱的阿拉伯海與起伏不定的努比亞山脈」，一一紀錄蔥蘢的桑吉巴爾海岸如何被棕櫚，芒果，香蕉，橘子，肉桂，菠蘿等肥沃豐饒的大自然綠色圍繞，以及穿白衣、戴紅帽的划手³⁹。兩相對照，可以發現譯者除描述當地地勢、種植與天氣外，逕自補述地理概況，協助不熟悉非洲地理的中國讀者掌控當地背景：「按散西巴爾，亦名桑給巴爾」，位於「亞斐利加東境」，乃是「四萬一千九百八十四方里」的彈丸小島，「洋面約四十度有奇，計七千三百餘里」。

在「採風問俗」的主旨中，丁雪田視角一路介入施登萊原著，「演說」風土民俗，如抵達烏蘇庫瑪 (Usukuma) 時見到公地勞作的場景：

村中有一公地，上豎木杆，繫銅鈴百餘枚。每日辰刻，社長派一人將鈴球力撼之，聲震闔村，男婦皆起，至公地操作。午後球又震，始回飲食，須明日復至矣，若逢雨雪，則各在家中操作。⁴⁰

此一片段乃是翻譯施登萊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抵達烏斯茂 (Usmau) 時紀錄該區行者擁有球型鈴鐺，以搖鈴提醒女人進行日常事務⁴¹。譯者繞出原著脈絡，從女人勞作變為男女勞作，自行加入一連串的情境虛擬，如「午後球又震，始回飲食」、「若逢雨雪，則各在家操作」，彰顯當地的勞作場景。

譯者對於非洲服飾裝扮頗感興趣，多處翻譯。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三日，施登萊來到黃米河 (River Wami) 的支流地昆地河 (Mkundi River)，發現與瓦社古哈 (Waseguhha)、瓦沙卡拉 (Wasagara) 族共享同語言的瓦古盧族 (Wa Nguru) 在耳環、頸套、髮飾等裝扮上也有相近的品味⁴²。對中國讀者而言，非洲族群的審美共感，恐怕不易理解，丁雪田視角恰好以中國的修辭美學改造當地服飾：

該處鄉民大半穿耳，耳上所戴碾石子以為纓絡，垂垂約三寸許，頸上則懸牛角鐵，以為美飾，亦有懸金銀珠者，面上多花點紋，川鐵石刺成，斑點多者以為美麗。其髮並無梳櫛，祇分為數綵，捲紋而上編成尖角如高髻。

³⁸ 同前註，卷1，頁15a-b。

³⁹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I, p. 22. 引文係筆者所逕譯。

⁴⁰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2，頁18a。

⁴¹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VI, p. 110.

⁴² *Ibid.*, chapter V, p. 72.

然髮之端，繫珠絡數串，皆鐵石爲之。⁴³

原著提及當地居民耳洞穿入葫蘆或圓木，譯著卻變爲是「耳上所戴碾石子以爲纓絡，垂垂約三寸許」；脖子懸掛小山羊角、銅線與大蛋形珠子，變爲是「懸牛角鐵，以爲美飾，亦有懸金銀珠者」；臉上染了赭色，變爲是「面上多花點紋，川鐵石刺成，斑點多者以爲美麗」；長捲髮辮繫著銅吊墜與白、紅色珠子裝飾，變爲是「髮之端，繫珠絡數串，皆鐵石爲之」。凡此種種，都可見到譯者透過丁雪田視角替非洲人體加工，塑造一更符合中國美學的裝扮與服飾。

（二）看圖說故事

比起施登萊的鴻篇鉅著，譯著只有九萬餘字，呈現不對等的翻譯比例。作爲一篇濃縮的譯著，譯者往往用不成比例的篇幅，安排丁雪田演述原著中附有圖片的部分。由於譯著由口述者與筆述者合力完成，至少對於擅長中文的筆述者而言，圖片比起文字，更具吸睛作用，因而更易受到青睞。

施登萊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記載烏克內維 (Ukerewe)，附上一組當地居民的圖片（見圖六），從穀倉、房子、凳子、木舟、漁網、勇士到女人乳房與脖銅環圈等。若就原著脈絡而言，烏克內維只是施登萊等人途經之地，非重點所在，施登萊只是輕描淡寫。可是，在圖片引導下，譯者卻是重點處理。關於聘娶，原著指出男方提供女方雙親十二隻山羊和三把鋤頭。若家境貧窮，可提供矛、盾或箭，在親家滿意前，婚姻無法成立⁴⁴。原本是條件轉讓說（家境若貧，可用盾、箭代替山羊與鋤頭），譯著卻變爲是列舉性條件：「男女聘娶，無六禮之將，婿家祇以羔羊十二頭、鐵錘二柄、大布數百，或數十匹，送於婦家，以爲訂婚之儀」⁴⁵；關於喪葬，原著指出當地喪親者將芭蕉葉捆在頭上，臉上塗著粉碎的木炭和奶油的混合物。譯著則是透過「黑」與「惡臭味」等視覺與嗅覺意象，渲染該地民俗：「首圍蕉葉一張，葉枯復易，面則抹以灰煤，雜以油漆，遙望之，黑而有光，近臭味作惡。」⁴⁶關於刑法懲罰，原著指出竊賊，通姦者和殺人犯處以死刑，若僥倖免於死刑，也會淪爲事主奴隸。譯著則寫「偷盜、奸淫、殺人三案，皆以斬決定其罪，不問輕重。如犯案之人，肯終身爲事主之奴，則可

⁴³ 盧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1，頁24b。

⁴⁴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XI, p. 200.

⁴⁵ 盧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3，頁1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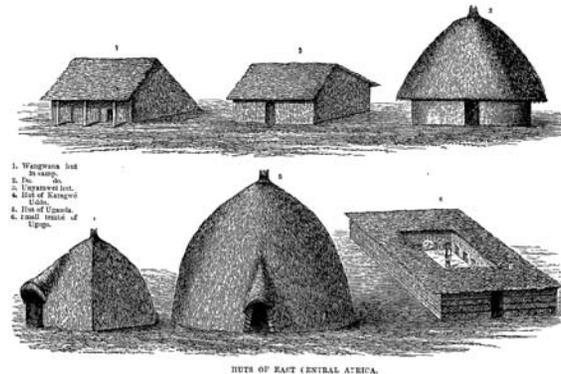
⁴⁶ 同前註。

恩免死殺戮，惟事主願收，方准免死」⁴⁷；關於服裝配飾，當地居民穿著布料乃是由牛皮，羊皮，香蕉葉或粗草編織混合而成，女人喜歡穿戴銅線項鍊，譯者甚至加入丁雪田的主觀評語：「以牛羊皮爲之，外束芭蕉索，頸中懸錢環數枚，纍纍如貫珠，以爲美飾。」⁴⁸



圖六：烏克內維 (Ukerewe) 組圖

施登萊原著多處圖文並茂，如提及烏干達農民 *Kopi* 之家時附上當地茅居組圖（見圖七）⁴⁹，描述農民 *Kopi* 的個人家居。可是，此一中非茅屋圖片，更加凸顯當地一般人的家居，而非 *Kopi* 個人家居而已。在圖片引導下，譯者也一一翻譯箇中內容，且做出調整，如將 *Kopi* 個人家居變爲是「各家大門」、「每村」等整體性的指涉，鉅細靡遺地演述烏干達農民的家居樣貌：「入其宅，廳事一所，高大軒敞，作圓式如牛棚」、「中分前後兩間，隔以瞭窗，窗以細木爲



圖七、Huts of Central Africa（中非茅屋）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同前註。

⁴⁹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XV, p. 303.

之」、「廳後板屋一區，無窗戶，為婦子家人偃息之所」、「床榻用木板支之，製殊粗陋」、「廚房建於廳後，家人婦子工作其中。所用器皿，皆瓦缶、藤籃、鐵鏟、梭席、竹筒等物。鍋灶之式，亦異尋常」⁵⁰。

施登萊原著提及施登萊見烏干達國王的片段，附有皇室大殿之圖（見圖八）⁵¹。譯者全力翻譯該片段，安排丁雪田演述眾人進入「覆以香茅，異常整潔」的內殿，見到「年約三十許，白衣紅袍、繡花肩帔，而赤足禿首、髡頂無髮」⁵²的梅植國王，接而描述國王賞懲分明的面目：鄰國使臣貢奉「肥牛一百頭」時，王賞臣下各一頭，「左右伏地謝恩，大呼多洋齊」；派遣宣伽討伐叛變的地方將領時，宣伽當廷叩首應諾：「吮王手掌數四，又呼多洋齊數十聲」⁵³。皇殿有人掉落手鎗而引起聲響時，「王命杖五十」⁵⁴；朝廷中出現咳聲，「王注視之」，「咳者懷慙畏懼而退」；米郎國公使前來告知無法貢獻，國王疾言厲色：「朕不欲爾等之物，如望休兵，可將去年殺我使臣之賊，取其首級來。」⁵⁵



圖八、Audience Hall of the Palace（皇室大殿）

（三）化繁為簡、避重就輕

施登萊原著涉及不少特殊的地方用語與概念，譯者要一一掌控，並非易事。針對不少概念或術語，原著前面解釋後，後面不再贅述，譯者若漏讀特定章節，便會茫無頭緒。丁雪田此一視角的介入，恰可化繁為簡、避重就輕，以「不知來

⁵⁰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4，頁4b。

⁵¹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XV, p. 309.

⁵²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4，頁5b。

⁵³ 同前註，卷4，頁6b。

⁵⁴ 同前註，卷4，頁6a。

⁵⁵ 同前註。

歷」、「不知何解」，讓讀者誤以為是丁雪田演述施登萊原著的內容，掩蓋自身不知不解的窘境。以譯著翻譯原著第十五章烏干達民衆信仰為例：

村口每有廟堂一座，謂係護宅之神，鄉民云：此神仁恕慈祥，不貪供獻，但能誠心感格，卽一盃酒，一蛤肉，一茅之獻，一錢之陳，亦得邀其默佑，降福消災。問其何神？則不知來歷。⁵⁶

事實上，此一「不知來歷」的「護宅之神」乃是原著所謂的 Muzimu 守護靈。原著第十二章早已解釋守護靈來歷，並非「來歷不明」，烏干達人普遍祭拜 Muzimu，戰事開始前會攜帶各種與守護靈和解的符咒到朝廷，讓君王以食指碰觸符咒，確保戰事順利⁵⁷。譯者顯然漏讀前文，譯到第十五章時不知何解，以「不知來歷」，避重就輕。此外，施登萊提及供奉 Muzimu 之祭品，主要是蝸牛殼，黏土揉成的球，特定數量的草藥、杜松樹 (juniper) 與被點綴上鐵的大羚羊角⁵⁸，譯者改為中國讀者更易理解的祭品：「一盃酒，一蛤肉，一茅之獻，一錢之陳」。

譯者不只翻譯庶民信仰，對於原著交代的宮廷文化，亦多有觸及，彰顯麥君與當地酋長、國王往來，如演述原著第十五章施登萊等人進入烏干達宮殿之場景：

麥君與余坐王之右，馬君坐王之左，相與畧言泰西風俗政令，既而百官來見，皆匍匐而入。其相見之儀，或以口親王手，或以鼻接王頰，以為親密，或伏地呼曰：「多洋齊！多洋齊！」不知作何解。⁵⁹

譯者碰到「多洋齊！多洋齊」此一當地用語，毫無線索，只能「不知作何解」。施登萊早於傳記第十四章解釋“Twiyanzi”是土語的對音，表示「謝謝」⁶⁰，因而後面描寫「多洋齊」時不再解釋。譯者忽略前文，如墜五里霧，遂安排丁雪田以「不知作何解」帶過。此外，譯者未錯過施登萊原著觸及的非洲最詭異的風俗——人民百姓歡迎羅剛 (Lukongeh) 國王的方式：

有大員求見，王令入。少頃，果見一官，身披羊皮短服，首束紅布，插雉尾簪花，趨入向王拍掌一聲，然後叩首。叩首已畢，立起向王曰：「伐

⁵⁶ 同前註，卷 4，頁 4b。

⁵⁷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XIII, p. 256.

⁵⁸ *Ibid.*, chapter XV, p. 301.

⁵⁹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 4，頁 6a。

⁶⁰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VIII, p. 144.

者、伐者、伐者桑害蘇拉。」王喜甚，亦拍掌答禮，既而令大員近前。王噓氣其面，復以口中沫，唾大員手中。大員啓奏數語，即以掌中沫揉搓，向兩頰拭之，作洗臉狀，然後拍掌三聲而退。麥君見此情形，腹中竊笑，然不解「伐者」數語，暗詢通事，知此係該國土語，猶言「早晨、早晨，好早晨，好日子，王好否也」。⁶¹

丁雪田演述朝廷內臣覲見國王的方式：臣下行跪叩禮，拍手擊掌，一邊喊「伐者、伐者」。此一「伐者」乃是原文中的“Wache! Wache!”，而「伐者桑害蘇拉」則是原文提及“Wache sug”與“Egsura”之縮寫⁶²，乃是「早安」、「日安」等問候語。國王往臣下掌心吹氣與吐口水，臣下視為榮耀，將口水抹眼睛與臉上。譯者以「腹中竊笑」描寫麥西登的內心反應，頗為傳神，不過卻止於奇風異俗的表層，忽略原著對於該怪誕文化的剖析，國王的唾液對當地民衆而言是一種洗眼劑 (collyrium)，格外受到珍視。

譯者調動敘述視角，安排丁雪田此一中國敘述人物演述施登萊原著內容時，可見到核心關懷的轉變：從原著「尋找尼羅河源頭」轉向譯著的「風土民俗」，反映彼時中國人「面向非洲」時所訴諸的普遍視野。丁雪田此一敘述視角演述非洲風土民俗時，實是對於施登萊原著的介入／補充／選擇／遮蔽，塑造更能符合中國脈絡的非洲內容。

四、拼湊片段：表達自身的訴求

譯者除在原著脈絡內透過刪除／保留方式，造成上述「拆除主幹」的主旨轉變外，又在原著脈絡外，自行疊加各種可以表達自身訴求或需求的片段，擴大譯著與原著的鴻溝。譯者對於各種片段的拼湊，傳達某種作為十九世紀後半葉文人的文化分身，遂使得譯著加入十九世紀中國後半葉的文人的色彩，往數個方向發展：情感、啓蒙與敘事。若將此一翻譯法置入西方論者所謂的「拼湊」(bricolage) 論，可見到此一不忠實於原著的片段，實具有積極的意義，反映譯者對於自我與世界的回應，表達彼時文人共享的結構：對於情感、知識與敘事的渴望。

⁶¹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3，頁16a。

⁶²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XI. p. 198.

根據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 對於神話的研究，指出神話作者群如同業餘的「修補匠」。「修補匠」固然無法像專業的建築師般規劃出一套成熟的藍圖，只能像「勤雜工」——「用手頭現成工具擺弄修理的人」，拼湊既有文化中現成的故事、敘事殘跡與各種斷簡殘篇。「修補匠」在「零件卻不齊全」的「拼湊」中，「借助一套參差不齊的元素表列來表達自己」⁶³。中西文學研究者在李維史陀的「修補匠」理論架構下，指出「拼湊」對於文學發展的特質與意義⁶⁴。本文欲關注的是：當譯者拼湊不同脈絡的元素時，如何透過一套參差不齊、混亂駁雜且不無矛盾的元素表達自身對於情感、知識與敘事的追求？

(一) 情感抒發：「有勝情而無勝具」

就一八八三年的〈小引〉一文，可見到譯者的翻譯因緣與動機：中國人因各種羈絆而無法遠遊，待可擺脫時已垂垂老矣，「有勝情而無勝具，是欲遊而仍不能遊也」⁶⁵，道出中國人的困蹇窘況。當譯者翻譯施登萊傳記時，卻因自身的詩學規範，而替「有勝情而無勝具」的「情」與「具」思辨做出另一番演繹，恰能

⁶³ 李維·史特勞斯著，李幼蒸譯：〈具體性的科學〉，《野性的思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3-24。李維史陀在文中對於「修補匠」有形象性的描述：「『修補匠』善於完成大批的、各種各樣的工作，但是與工程師不同，他並不使每種工作都依賴於獲得按設計方案去設想和提供的原料與工具：他的工具世界是封閉的，他的操作規則總是就手邊現有之物來進行的，這就是在每一有限時刻裡的一套參差不齊的工具和材料，因為這套東西所包含的內容與眼前的計畫無關，另外與任何特殊的計畫都沒有關係，但它是以往出現的一切情況的偶然結果，這些情況連同先前的構造與分解過程的剩餘內容，更新或豐富著工具的儲備，或使其維持不變。」（頁24）

⁶⁴ 如莫瑞提 (Franco Moretti) 援引李維史陀的觀點，指出在「標準的」文學時代中，一般會更講究穩定的範式、形式策畫與詩學藝術等。可是，在範式轉移的時期中，恰好相反，文學上的「變化」並非事先策畫，卻如同「修補匠」般拼湊各種片段，經由「最不負責任且最自由的果實」、「最盲目的修辭實驗」，反而成為文學改革的動力。史蒂方諾 (Stefano Ercolino) 則是援引莫瑞提的論點，指出「修補」總是以「離題」的形式出現，各種拼湊進來的片段如攻擊主線情節的「邊緣插曲」，擴大介面；李歐梵援引莫瑞提的論述，將“bricoleur”譯為「泥磚匠」，指出泥磚匠「往往從微不足道的小節開始」，「這裏堆堆，那裏砌砌，卻在不知不覺中引起小說形式的演變和發展」。分別見：Franco Moretti, *Modern Epic: 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 to García Márquez* (New York & London: Verso, 1996), p. 19; Stefano Ercolino, “Length,” in *The Maximalist Novel: From Thomas Pynchon’s Gravity’s Rainbow to Roberto Bolaño’s 2666*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 21。李歐梵：〈帝制末的文學：重探晚清文學——在常熟理工學院「東吳講堂」上的講演〉，《東吳學術》2011年第4期，頁46。

⁶⁵ 佚名：〈三洲遊記小引〉，頁353。

反映近現代中國譯者如何替非洲冒險記拼湊文人情感的片段。

十九世紀後出現的幾部「非洲探險記」，皆以科學理性視角為訴求，如博頓、史畢克、葛蘭特等人攜帶儀器、人力與物資，進入非洲實地考察，經由儀器測量與地圖繪製等方式，揭開以往罕為外界所知的非洲內陸。可是，對於前輩的「科學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 視角⁶⁶，施登萊仍有不滿，早在《我如何尋找立溫斯敦》便指出缺漏：「關於非洲的地理、人種與非洲內陸相關的資訊是不可或缺的，但卻沒有任何書籍提供前往非洲探險前所需的資訊」⁶⁷，接而又在《穿越黑暗大陸》羅列各種數據與表格，一一道出各地區人口、地理與生產，試圖以更科學的方式呈現非洲內陸。在填補技術管理與物資數量等空白的自覺意識上，施登萊記載箇中細節，詳細釐清非洲內部的差異。

當虛白齋主與鄒弢面對此一彰顯人力、物資等實用訊息的「非洲探險記」時，卻因自身的位置而牽動書寫旨趣，鉅細靡遺地交代眾人餽贈的「程儀路菜」，如岳家宣子明送「洋蚨二十元，火豚二，醬鴨四，鱔炙羹一瓶」；襟弟李東生送上「程儀洋十元，路菜代儀洋四元」；母族表兄同。其餘各親友所餽，共洋一百十三元，路菜則火豚十九等，頗有一爭高低的意味。譯者一一寫出「程儀路菜」，指稱是「人情義理」、「不言而喻」⁶⁸。相比起原著開端處的各种表格與清單，譯本卻在卷首羅列餞別禮金，甚至逐一列出地點、時間、參與人、贈禮、談話等，反映中國譯者對於文化傳統的需求更大於冒險旅行的實際訊息，替〈小引〉中的「情」、「具」思辨，衍生另一層次的轉調。原本，「情」與「具」作為一組修辭，在〈小引〉是指出中國人的「情」與「具」向來失調，因為「上則牽於父母，下則累於妻孥」等倫理束縛與日常羈絆而無法出遊，待可擺脫時，已是「體弱身怯」，「有勝情而無勝具，是欲遊而仍不能遊也」⁶⁹。在翻譯層次上，譯者衍生另一層次的「情」、「具」思辨：注入自身的情感意識，以「情」抑「具」，遂使得十九世紀西方人士的「非洲探險記」所隱藏的科學理性視角轉而到文人的情感脈絡。事實上，早於一八七九年，沈定年翻譯《黑蠻風土記》時便指出中西遊記的差異：

⁶⁶ 此乃是借用立溫斯敦非洲探險記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 Harper, 1858) 之書名。

⁶⁷ Henry M. Stanley, "Organization of the Expedition," in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p. 22.

⁶⁸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1，頁2a-b。

⁶⁹ 佚名：〈三洲遊記小引〉，頁353。

西人行事，雖萬里之遙，千金之費，輒不憚煩勞，必試行之，而後心快意慊。且其著書立說，又必躬踐其地，親見其事，而後托楮墨以發為言。中土儒者足不出戶庭，而矜言著述，事不經閱歷，而臆造端倪，故說部之書，十九偽託。求其以空閒之歲月，作汗漫之游蹤，歸而記載，傳信後世，古今以來，杳不多覩。以視此書之實而有徵，奚啻霄壤。⁷⁰

沈定年透過二分法指出西人「躬踐其地，親見其事」，中人卻是「臆造端倪」、「十九偽託」。整段論述的核心與其說是文字表層所反映的中西遊記的價值差異，倒不如說是隱藏在文字背後的翻譯動機與實踐結果的悖論。雖然，譯者意識到中人遊記缺憾，承諾「實而有徵」的翻譯原則，卻又重蹈自身批判的「臆造端倪」、「十九偽託」等中人著作現象，將十九世紀以技術管理、工具理性作為訴求的非洲傳記導向中國文人的情感脈絡，遂使得譯本潛藏著從「具」到「情」的軌跡，陷入動機與結果分裂的循環圈。

譯者在一充滿悖論的翻譯架構上，如修補匠般清點各種工具與材料，調動一系列抒發或渲染情感的詩詞、筆記、日記、信件與墓碑文等，注入譯者的主觀與情感意識，衝擊原著的工具理性傾向。丁雪田作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更能彰顯中國人物面向世界時跌宕起伏、波瀾變化的情感。卷一隨處可見到作為十九世紀末的中國人面向世界時「琴劍遨遊志自雄，浮槎萬里去乘風」的雄心壯志，即或於錫蘭遇「非逃即死，救亦無用」的海難事件，巴仲和高呼「遊子豪情壯，乘輪遍八方」，丁雪田「茫茫四顧，天地皆空，心中歡暢已極」⁷¹。可是，隨著離鄉漸遠，羈旅情懷愈濃，歷經風霜，高亢激昂的情感轉向傷感低沉，蘇西辣一帶遇村民襲擊時「悔作出門之舉，不覺相對歔歔，悽然淚下」⁷²。愈到後半部，出現愈多撩動情感的節日，歲末年終時「冬冬臘鼓，歲已催殘，遊子飄零，故鄉天上，掬青衫之淚」，新年伊始時又是「歎萍蓬之泛泛，慨時序之匆匆」，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讓人物哀腸百轉⁷³。

相比起原著對於技術管理的重視，譯著有不同的訴求與旨趣，繞開實務經驗

⁷⁰ [清] 沈定年：〈序〉，收入立溫斯敦著，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黑蠻風土記》（出版地、出版單位不詳，1879年），頁2a。原版未註明刊地與刊者，根據其序文「歲在屠維單閼」，可推算是一八七九年出版。本文所據乃是收藏於韓國首爾「奎章閣」的原版本。

⁷¹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1，頁4a、5a-b。

⁷² 同前註，卷3，頁11a。

⁷³ 同前註，卷3，頁13b-14a。

與具體訊息，更重視感性經驗，無論是相互酬唱或是哀悼送別，都能反映人物的情感狀態。在「秋水芙蓉」般「相得益彰」的中國文人「丁雪田」與「巴仲和」的帶領下，眾人詩興泉湧，如「曾為駐華翻譯官」且「喜中華文字」英國駐非領事馬君「當筵索句不能無詩」，即或是對「中華文字，不甚明晰」的色勒亦可「挽余代作七古一章」。「登高望遠」時必然「以飄零之客，作汗漫之遊，吟大海之蛟龍」，「中秋佳節」時又是「客懷譴繾綣，催詩興到」。從中國文人、海外官員到非洲從員，都捲入「臨風釀酒，對月吟詩」的行列⁷⁴。譯者透過詩詞經營聲調韻律、文字形式與意象符碼等經營，層層開拓人物的情感紋路與內心世界，如「望月懷遠」的場景中，譯者將遊子置入茫茫的宇宙場景中，挑動遊子情懷：

戌亥之交，鏡月東上，余同仲和升艙玩月。但見遙天無雲，碧宇澄淨，團圓寶相，如夜光珠一顆，從東山推起，捧將上來。霎時海中光明不定，如萬道金蛇，浴波噴浪。茫茫四顧，天地皆空，心中歡暢已極，因口占云：「萬里長風路，扁舟入大荒。天浮銀界闊，水浸玉盤涼。回首家鄉遠，同心形迹忘。海波渺何極，詩思正滄滄。」仲和亦次韻和之云：「遊子豪情壯，乘輪遍八方。那知金鏡月，遙想玉閨涼。客路何堪計，鄉心不可忘。海天憑眺處，嘯語激瀛滄。」⁷⁵

譯著安排丁雪田與巴仲和行進水路時，插入中國的詩詞片段，讓兩位中國文人「升艙玩月」，透過大角度仰望天地的場景，將個人放置到浩瀚無垠的天地中發現自我，彰顯內轉向的情感意識。個體自我在浩瀚天地中，愈能凸顯「茫茫四顧，天地皆空」的空間感受，牽動「遙想玉閨涼」、「鄉心不可忘」的思鄉情懷之餘，又浮現「萬里長風路」、「遊子豪情壯」的壯志情懷。譯本以詩詞為媒介，塑造可讓主體與宇宙融合為一的自然天地，銘刻人物的情感，無論是人事遷移到季節變動，流露中國人物的價值思考與文化關懷。

譯著在日記、詩詞架構上又拼湊書信內容，反映中國文人面向「遠遊」此一議題時的倫理牽掛。為彌補因遠遊而引發的倫理衝突，屢屢強調收信與寄信之行徑，如西貢途中「作書致內子，擬至西貢發寄」⁷⁶、「至新加坡，再當削箋投

⁷⁴ 同前註，卷1，頁1b、19a；卷2，17b；卷3，頁2a；卷2，頁17b、17a。

⁷⁵ 同前註，卷1，頁5a-b。

⁷⁶ 同前註，卷1，頁5b。

報」⁷⁷。固然，施登萊原著亦記錄收發信行徑，可是大多止於行爲之敘述，《斐洲遊記》卻是透過書信內容，詳細記載家鄉的人事變化，從兄嫂嫌隙、春保相親、春甥升學、友人升官到田園變賣與祖屋處理等，頗能反映譯者因自身的倫理焦慮而牽動的譯本轉向：「家政賴卿主持，諸事務祈留心，與令兒子明及玉堂升之曼卿諸通家，商而後行，想無貽誤」⁷⁸、「春保讀書若何，趁此少年，務須用心督勉……巴仲和家近況，未知若何？寡婦孤兒，煢然無靠，倘有需用之處，總須稍予通融。」⁷⁹以上兩段引文分別是丁雪田分別於印度洋遭遇海難，與巴仲和患病身亡後執筆寫信的家書內容，可見人物即或在生離死別時也不忘寫信對家人諄諄教誨，愈是絮絮叨叨，瑣碎平淡，愈能反映丁雪田作為人夫、人父、人友的形象，彌補因遠遊而導致的倫理缺憾。

從上所言，顯見十九世紀譯者面向「非洲冒險記」此一具有嶄新視野的作品時，猶如「修補匠」般拼湊日記、詩詞、書信內容，層層挖掘人物的情感意識，遮蔽原著有意訴諸的理性、客觀、科學、技術等視角。譯者彰顯人物「面向世界」時的內心圖景，從遊子情懷，吟詩賞月，登高望遠到倫理道德等，情感萬千，在後起的世界空間體系上凸顯人物的情感意識，遂使得原著的工具理性轉向譯著的情感脈絡。

（二）知識啓蒙：「披覽一過，亦堪長聰明，資學問」

《斐洲遊記》逸出施登萊原著的工具理性視角，以「情」抑「具」，可是並未全然向情感脈絡靠攏，卻又置入各種知識啓蒙的片段，拼貼各種新知，回應《益聞錄》的「益聞」主旨。本節將探討譯者如何在翻譯著作內拼湊各國時事、新聞、歷史、地理、制度等片段，讓文學翻譯變為知識傳播的一環？

一八七三年，〈小引〉指出《三洲遊記》「茶餘酒畔，披覽一過，亦堪長聰明，資學問」⁸⁰，反映譯者藉由翻譯助長讀者知識的期待視野。譯者調動不同脈絡的知識片段，嵌入學校、輪船、照相機、醫院、人種、軍事與餐飲等，恰好跟抒情感懷的片段形成一強烈對比。對於這一代文人而言，召喚抒情傳統而得到

⁷⁷ 同前註。

⁷⁸ 同前註，卷1，頁17a。

⁷⁹ 同前註，卷4，頁49b-50a。

⁸⁰ 佚名：〈三洲遊記小引〉，頁353。

的審美滿足尚不足以回應急遽轉變的外在世界，遂拼湊各種知識片段，讓《斐洲遊記》的形式更顯分歧離題。十九世紀後半葉，傳統文體恐怕並非傳達新知的最佳載體，一批具有嶄新視野的文體因運而生，成為譯本挪用的對象。這些往後被譚嗣同(1865-1898)稱「報章體」、梁啟超稱「新文體」(或「時務體」)的文章⁸¹，具體定義未必一致，內容不再亦步亦趨於《易》、《詩》、《書》、《禮》、《春秋》等傳統經典，重視各大洲歷史、地理、數學、天文學、機械學等內容，介紹時事新知，承載公共性議題，訊息功能更大於美文賞析，夾敘夾議，建立起公共言說的書寫特色。

在「長聰明，資學問」的訴求下，虛白齋主與鄒弢以自身的辦報之便，拼湊各種刊登於《益聞錄》的文章。從卷一到卷四，《斐洲遊記》嵌入猶如「談瀛錄」的知識談話，涉及美國最多，實跟《益聞錄》刊登一系列「美國」的通訊文章有關。其中，以「曾經滄海」為筆名的通訊者之文章大量被截入《斐洲遊記》，如〈遊美國紐約大醫院記〉(第47號[1880.5.2])、〈遊美國大花園記〉(第55號[1880.6.27])、〈美國舞戲記略〉(第56號[1880.7.4])、〈遊美國啞人院〉(第62號[1880.8.14])、〈遊雪加古大學院記〉(第83號[1881.1.5])、〈遊格林礮廠記〉(第86號[1881.2.5])等，開拓譯本的美洲視野。曾經滄海身分不詳，極有可能是七、八〇年代的訪美成員，其〈遊美國啞人院〉截入《斐洲遊記》後，變為是麥君談及自身遊逛「美國啞人院」的內容。譯文寫了雪田隨麥君及土兵「攜隨身行李，洋鎗藥彈，裹糧入林」⁸²後，天外飛來一筆，拼湊美國啞人院的介紹：

按西國立法，凡有貧病殘廢之人，均設公院安置。其經費公董量力捐助，或國家頒賜，或於稅項下抽提，法至良，意至美也。啞人院在華盛頓京城，寬廣約三里，規模宏廠。四圍以矮松編籬，大門乃白石築成，精緻光潔，罕有其倫。門內左右，各峙石像一，蓋係法國人(音)[首]創啞人

⁸¹ 譚嗣同〈論報章文體〉提出「報章體」包羅萬象，「其體裁之博碩，綱領之匯萃」，從「臚列古今中外之言與事」的紀體、「縷悉其名與器」的志體、「發揮引中其是非得失」的論說體到「宣撰述之致用」的敘例體等。〔清〕譚嗣同：《譚嗣同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54年)，頁118-119；梁啟超稱「時務體」：「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77。

⁸²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4，頁35b。

院，教啞人者。院內大小房屋一百八十餘間，廳事五座，教堂一，餘俱啞人臥坐之房。此外若書房、大菜房、洗浴所、憩息所，無一不備。……院中啞人，每日課程，午前學習手法，午後默誦經書，傍晚男子習手藝工作，女子習針刺縫紉，皆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教導之。……師傅正副各一人，教習手藝，師傅十六人，女教師二人，總教習一人，總管一人。若啞者家本殷實，則入院時上等者，須捐助英銀一百磅，中等五十磅，下等二十磅，制度規模有條不紊。院之左花園一區，奇石玲瓏，樹木繁茂，頗足觀瞻。⁸³

全文抄錄〈遊美國啞人院〉一文，除零星刪除文字段落外，箇中差異便是修辭細節，如「奇石突兀」變為「奇石玲瓏」，「樹木蕭森」變為「樹木繁茂」。譯本藉由麥君之口，介紹華盛頓聾啞學校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模式，反映西方的教育制度與社會福利，描述井然有序。從學校的座落地點、規模擺設、外觀景致、創始者、室內擺設、課程教法、師生人數、入院方式到畢業出路等。

譯者向《益聞錄》借取資源，共享時事新知、海外通訊與公共議題等。譯者移植報刊文章時較無顧忌，甚至調動一整組文章，如一八八一年，《益聞錄》第八十三期刊登一系列介紹英美教育、工程、科技與器物的文章：〈遊雪加古大學院記〉、〈估計巨工〉、〈照影愈奇〉、〈英鑄大炮〉⁸⁴。在譯者移花接木下，搖身一變為麥君九月七日遊歷非洲時因「無美景可觀，乃回行帳，與仲和等暢談海外事」的內容：「麥君言曾至美國遊歷雪加古學院」、「該處又有照影之法」、「麥君又談及泰西兵制，及近日器械鎗礮之用」⁸⁵。譯者看似遺漏介紹英法「海底隧道」的〈估計巨工〉，事實不然，只是移到另一談論「泰西之法」的場合，由色勒道出「鑿險緬幽，飛輪越海者，莫如法國之路，法國加來城至英國度佛來城，相隔一海，廣七十餘里」的海底隧道⁸⁶。無論就雪加古大學制度、照影之法、泰西大炮、海底隧道等闡述，提供不同於中國器物制度的經驗模式與知識學理，對於晚清讀者頗有參照的意義。

⁸³ 同前註，卷4，頁36b-37a。關於原文對照詳參〔清〕曾經滄海：〈遊美國啞人院〉，《益聞錄》第62號（1880年8月14日），頁190-191。

⁸⁴ 曾經滄海：〈遊雪加古大學院記〉、〈估計巨工〉、〈照影愈奇〉、〈英鑄大炮〉，《益聞錄》第83號（1881年1月8日），頁11-12。

⁸⁵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2，頁22a-b。

⁸⁶ 同前註，卷4，頁33a。

爲避免這些片段過於支離破碎，譯者透過人物對白、回憶與自述等方式，串連《益聞錄》的新聞報導與通訊錄內容。無論病榻期間、百無聊賴或輾轉難眠時，人物都可侃侃而談，如「有與船主及西登暢談行海事」、「麥君回舟臥後，與仲和以西語談時事，并論電學」、「風尙未息，不得啓行，又相與談海外事」、「仲和疾，并與余談天」、「初七日晨起無事，與麥君閒話」、「晚同色勒、麥君談地理」、「晚又與色勒談天，色勒言平生曾兩至紐約」、「十九日，行至一山下，支帳宿，夜深無事，與麥君、色勒閒談，各道所見」⁸⁷。

譯者又以主線搭配旁線的對話錄串連各種知識言說，避免過於冗長枯燥，如讓麥君敘說美國器物制度時，安排武員兼僕人康庇介紹紐約醫院：「紐約城有大醫院一所，凡五進，規模宏敞。遇有異症獲痊者，必將其病處裝成模樣，與生人無異，藏玻璃櫃中，供人觀看，驟見之，幾莫辨真僞。」⁸⁸ 關於紐約醫院的介紹，除零星刪除數行文字外，幾乎全文照抄《益聞錄》第四十七號〈遊美國紐約大醫院記〉。原文介紹五個區域：前兩進乃是玻璃櫃陳列的病理樣本區與體軀幹、手足、臟、肺、肝、腸等，第三進則是以藥水保留屍體區，第四進則是以實例展示胚胎成形的歷程，第五進裝了包括中國人頭顱的人身枯骨⁸⁹。《斐洲遊記》誤刪「第四進」字樣，遂使得譯著第三進同時涵蓋原文的第三進（藥水保存屍體）與第四進（胚胎成形過程）。雖有刪除情形，大致可看到原文對於紐約醫院的介紹，從病理、身軀、胚胎到頭顱等展示，標示一套涉及剖切、保留、標籤等新處理方式的醫療體系，恰可反映十九世紀西方醫學興起的醫療視野。

關於施登萊原著最核心的「非洲」路線，譯者拼湊《益聞錄》報導或介紹「非洲」的片段。根據筆者的追蹤核對，連載於一八八四年《益聞錄》第三六九、三七三號、三七五、三七七、三七九、三八一號之〈亞斐利加洲總論〉乃是《斐洲遊記》主要的依據文章。雖然，《益聞錄》未標上作者之名，可是根據一八九九年《五洲圖考》之序文，《益聞錄》有關「非洲」之文章出自於許彬(?-?)⁹⁰。許彬，字采白，乃是《益聞錄》主將之一，在《益聞錄》編譯一系列有關非洲的文章如〈亞斐利加洲總論〉、〈撒哈拉〉、〈蘇丹〉、〈亞斐利加州西

⁸⁷ 分別見：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1，頁5b、12a、14b；卷3，頁12a；卷4，頁14a、19a、30b、26b。

⁸⁸ 同前註，卷4，頁28b。

⁸⁹ 曾經滄海：〈遊美國紐約大醫院記〉，《益聞錄》第47號（1880年5月2日），頁99。

⁹⁰ 李杅：〈序〉，收入龔柴：《五洲圖考》，頁3a-b。

境〉、〈亞斐利加洲南境〉與〈亞斐利加洲東境〉等。相比起十九世紀晚清中國作者普遍對於「非洲」投射的刻板印象，〈亞斐利加洲總論〉以俯瞰式視角，瀏覽非洲歷史地理、族群習俗、風俗文物、動物植物等。當《斐洲遊記》藉由該文描述非洲族群時，稍稍得以脫離將「非洲」刻板化的窠臼：

半皆彬彬美麗，秀色可餐，其面色黃黑者，十之二三。男子全身裸赤，自頂至踵，惟腰間前後，掩小白布一方，束以五色帶，闊約三四寸，垂垂然拖下二尺許。帶上繫玉石等物，亦有金銀者。手各有釧，頸各有圈，腳各有鐲，皆以金銀銅爲之。頭上之髮，盡行薙去，惟額上蓄留幾許短髮，垂下，覆及眼角。⁹¹

在「野族」形象普遍籠罩的時代，上述片段卻能區分不同地區的居民形象，如南方黑人的居民的髮型、服裝與飾品。從頭髮「盡行薙去，惟額上蓄留幾許短髮」、全身「惟腰間前後，掩小白布一方，束以五色帶，闊約三四寸」到「手各有釧，頸各有圈，腳各有鐲，皆以金銀銅爲之」，顯得「彬彬美麗，秀色可餐」。此外，譯本安排人物遊「西北郊小山之麓」⁹²的場景，乃是拼湊〈續錄亞斐利加洲總論〉一文，只是將「亞斐利加洲」改爲「西北郊小山之麓」，以全文照抄的方式詳盡介紹非洲鳥禽，如囊鶴「嘴潤約二寸許，能於空中迅啄飛鳥」、白鵲鳥「身大逾鶴，下喙垂下寸許，類巨囊可貯食物，性喜食魚，或伺於河畔」⁹³。

《斐洲遊記》拼湊一系列海外場景如「華盛頓啞人院」、「紐約醫院」、「羅馬教堂」、「非洲鳥禽」等，從歐美器物發明到非洲部落族群與園囿動植物等，恰能反映十九世紀各種海外知識在中國報刊的傳播與累積成果。各種知識言說，擴大譯本構面，形成離題且多元的視野。無論敘述語調或文字風格，都有別於傳統文體的情感渲染，內容遠超出傳統聖賢的教誨綱目，更側重現代知識與公共事務，講究實證依據與科學基礎，反映譯者對於「長聰明，資學問」的訴求。

（三）敘事想像：「怪怪奇奇，良堪悅目」

《斐洲遊記》附上的〈序〉中指出「某嘗閱其記，見怪怪奇奇，良堪悅

⁹¹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2，頁9a。

⁹² 同前註，卷1，頁24b。

⁹³ 同前註，卷1，頁25a。

目」⁹⁴，頗能反映譯者的接受視野。當譯者拆除原著主幹，拼湊片段時，接收與凸顯原著「怪怪奇奇」的部分，甚至調動自身的敘事傳統，套入中國說部常見的場景⁹⁵、情節與形象等，使得原著的地理學路線充斥著各種具有敘事張力的情節故事，恰與譯文中有意彰顯的現代知識片段相互拉扯，道出知識真理與敘述欲望之間牽扯不清的關係，反映駁雜與複雜的價值方案。

相比起口述者虛白齋主，深受傳統說部浸潤的筆述者鄒弢，更可能是敘事加工者。鄒弢一生創作小說不輟，早於居住蘇州期間的一八七八年，便著有筆記小說《澆愁集》，一直到移居上海數十年後的一九一二年出版仿聊齋文體《瀟湘館筆記》，留下多種雜記軼事類作品。研究者已指出鄒弢〈蘊香園〉受《泡中富貴》啓發、〈烏衣公子〉有〈南柯太守〉之影、〈愈生逸事〉可與《嬌紅記》對照、〈亭亭〉對應《夜譚隨錄》⁹⁶。鄒弢對於傳統說部如數家珍，在《澆愁集》序中逐一點評：《豆棚評話》「老髯說鬼」、「干寶《搜神》」、「方叔之談諧」、《洞冥》亦是寓言，《莊》〈騷〉「半多托興」、「述異而志《齊諧》」等⁹⁷。從此切入，不難理解，譯者面對施登萊「怪怪奇奇」的片段時調動傳統說部常見的場景、人物、主題與套式，如眾人從「迦古羅山」(Nguru) 進入樹林時差點全軍覆沒一節，乃是翻譯施登萊一月十日越過黃米河 (Wami River) 後進入樹林時因缺乏糧食而危在旦夕，槍聲突然響起，先前被派到其他村莊尋找糧食的隊伍及時趕回，解救眾人⁹⁸。當譯者面向此一入林遇險得救的敘事時，調度《水滸傳》山岡松林的符碼，盜賊原本見麥君百餘人，喬裝路人，卸下眾人心防後，另一同夥人前來販水。麥君見路人飲水無異後，「將甯中水盡購之」，「腹中皆絞痛異常倒地亂滾」。就在全體幾乎慘遭殲滅時，到其他地區補給的救援隊

⁹⁴ 虛白齋主：〈序〉，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頁 1a。

⁹⁵ 根據譚帆對於「說部」概念的梳理，指出古代「說部」並非單一的文體概念，而是一種著述體例，是由「說」之諸種義項衍生出來的眾多文章、文體與文類的匯聚，大體上可分為論說體與敘事體。隨著小說文體的獨立與地位的提升，敘事體一家獨大，清末民初以來，「說部」最終成為「小說」之部。本文對於「說部」的定義，乃是採取清末各家更偏重於「敘事體」的用法。參見譚帆：〈「說部」考〉，《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 227。

⁹⁶ 蕭相愷：〈序〉，〔清〕鄒弢著，王海洋校點：《澆愁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頁 4。

⁹⁷ 同前註，頁 2。

⁹⁸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V, p. 87.

伍趕至，「燃鎗擊之」，取出「藥入丹田奏功甚速」的「解痛藥酒」⁹⁹。此由綠林、盜賊、下毒、解毒組成的片段，與《水滸傳》蒙汗藥味充斥的江湖場景如出一轍，有困境、計謀、周旋、解決等情節，使得晚清論者發出如此評論：「《水滸》記智取生辰綱一事，自是耐庵虛構，而閱《三洲遊記》，阿非利加野人，竟有真用此智而行劫者，豈黔種中亦有智多星歟？」¹⁰⁰

當譯者透過各種知識片段開啓世界的想像，同時又藉由敘事手段展現想像的世界，在新舊體系中轉換自如。不同於往後五四時期「傳統」與「現代」刻意對立化的二分法策略，晚清作者更能新舊雜陳、兼容並蓄，在現代非洲地理路線上召喚綠林大盜、毒藥昏迷等傳統說部情節。文學傳統的符碼一再出現，如譯者安排衆人於「重陽日」進入高山時召喚桃花源之村莊：「編樹成村，雞犬桑麻，頗有桃源氣象」、「稻粱果穀，物產豐饒」、「爭邀至家，設酒殺雞作食，一時村中婦孺，紛至沓來，觀看異邦人物」、「居民衣服，均以粗麻爲之，外衣垂垂至膝」¹⁰¹。從村莊、農作、民風與服裝等，都可見譯者利用陶淵明筆下的漁夫闖入桃花源之際遇，虛構麥君等人進入非洲所受到的款待。

《斐洲遊記》對於原著戰爭場面的選擇性翻譯與創作，更可反映他對於「怪怪奇奇，良堪悅目」¹⁰²的喜好。施登萊多次投入非洲戰役，五味雜陳。早在一八七一年，他首次進入非洲途中逢阿拉伯人與米蘭波 (Mirambo) 紛爭，遍地烽火。他爲分享榮耀而投入，不料戰局曠日廢時，又遇熱病襲擊，損失慘重。施登萊在《我如何尋找立溫斯敦》自省因介入戰爭而引發的慘重損失與路程延宕，更察覺戰友的背叛，悔不當初¹⁰³。一八七五年，他第二度進入非洲途中探訪 Mtesa 國王，正逢國王討伐未繳納獻金貢品的 Uvuma 族，再次投入戰場：「我很高興此刻我在這裏，希望能在戰爭中發揮我的影響力」¹⁰⁴。在十六章的傳記中，施登萊以將近五分之一（第十二到十五章）篇幅描寫 Mtesa 國王的戰爭，包括國王如何繼位、各族群恩怨、地方派系管理與進貢制度等。晚清譯者一一撇開原著的戰爭脈絡，只針對「怪怪奇奇」部分加以發揮，且調動中國戰爭書寫中屢見的

⁹⁹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2，頁1a-b。

¹⁰⁰ 佚名：〈評林〉，《小說林》第9期（1908年2月），頁14。

¹⁰¹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3，頁1b。

¹⁰² 虛白齋主：〈序〉，頁1a。

¹⁰³ Henry M. Stanley, "Life in Unyanyembe," in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pp. 258-309.

¹⁰⁴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XII, p. 245. 引文係筆者所逕譯。

「忠」、「惡」對峙，讓原本未繳交貢品的敵國變為「失德不道」、「盜賊蜂起，屢到吾國行劫」，屢勸不聽，梅植國王不得不出師。輔佐國王的麥西登「多才多藝，曉暢戎機」，從分析戰情到整兵練將，在在呼應中國戰爭演義中屢見的忠心耿耿、運籌帷幄的軍師形象¹⁰⁵。

在翻譯改寫中，觸及有違於中國倫理的片段，譯者予以改寫。原著提及梅植國王欲燒死 Wavuma 酋長，替先王 Suna 復仇，施登萊嚴厲指出先王將會為他的叛離行為在靈界哭泣，且以自身去留要脅¹⁰⁶。此一有違於君臣倫理的僭越行為，在譯著中受到調整，變為是麥君苦勸國王，在君臣共計，以智取勝對手。譯者著墨於以幽靈計謀智退對手的片段：

〔麥君〕借兵士二千，令於深山伐取大木。不一日，木至，乃督工尅日潛造巨舟一艘。高七丈、長五十丈，上插五色旗幟，器械鮮明，伏七十人於舟中。麥君下令，命乘黑暗中蕩去。既至該處，各人在舟上面塗五色，以十人擊金鼓，五十人蕩舟，十人大呼「願降否？願和否？」六字，俟其允許願和，然後儘力蕩回，須飛行神速，以疑其心。令畢，眾皆依計去。天甫明，巨舟已疾駛回，進帳繳令，謂舟近彼岸。彼從未見此巨舟，驚疑不定，始亦火箭、火鎗並至，見舟無所損。又見余等面目五色，擊鼓大呼，疑為河神，因報入敵帳。有一大員出，見余舟，亦甚駭，又見余等言，竟允議和。余等始疾駛而回，敵人見此情形益以為神靈默佑。王與麥君皆大喜，命急將巨舟沉於河，勿為敵人所見，諸將得令而去。¹⁰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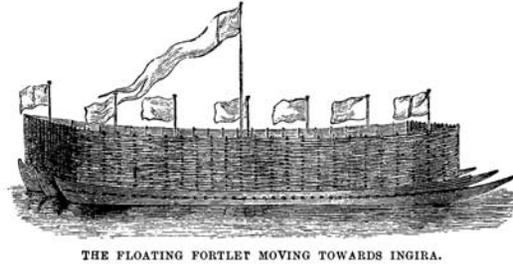
在原著圖片的引導下（見圖九）¹⁰⁸，譯著寫出麥君利用部落的迷信心理，伐木造出刀槍不入的浮堡，假貌河神，震懾敵方。敵軍因屢攻不下，誤將「面目五色，擊鼓大呼」的浮堡當成河神，從「驚疑不定」、「甚駭」發展到「竟允議和」。此一翻譯橋段大幅度簡化原著內容，略去海上漂流浮堡之構造、雙方陣營布置、軍裝武器等，恰能反映譯者凸顯「怪怪奇奇」的部分，透過場景、聲音、衝突、節奏等，有聲有色地搬演河神鬼魅，彰顯敘事效果。

¹⁰⁵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4，頁2a。

¹⁰⁶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XIII, p. 264.

¹⁰⁷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4，頁3b。

¹⁰⁸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hapter XIII, p. 265.



圖九、The Floating Fortlet Moving towards Ingira（航向印其拉的浮堡）

當譯者展開敘事筆調，召喚中國傳統小說體的修辭、意象與文體模式，甚至可見《世說新語》般的言談軼事與人物品評，展現人物風貌與事件奧妙，言簡意賅又妙趣橫生。以「借船渡河」為例，乃是對應施登萊一八七五年五月向羅剛國王借舟之片段，實涉及暗潮洶湧的非洲政治：施登萊因獨木舟不足，擬放棄水路，改從瓦馬 (Rwoma) 國穿越陸路到烏干達。可是，瓦馬國王與敵視白人的米蘭波 (Mirambo) 結盟，拒絕施登萊之請求。施登萊對於陸路與水路都有不少評估，分析政治局勢，羅剛國王取得政權經過，瓦達杜盧 (Wataturu) 與瓦格拉維 (Wakerewe) 族的差別等。經過各種評估後，施登萊決定向羅剛國王借船，以水路前進¹⁰⁹。譯著捨棄原著長篇闊論的分析，聚焦於具有敘事張力的片段，凸顯原著中具有「偉大治療者」(great medicine man) 之稱的羅剛國王懇求施登萊傳授如何把人變成獅豹、造風造雨術、提高女性受孕率與男性性能力等歐洲秘訣？譯者放大麥君與羅剛國王的對話片段：

王席地，居中而坐，見後，令麥君旁坐。容色謙沖，問泰西風俗，并各種西法。麥君約畧指陳。王甚喜，又問貴國王有何靈能，可以變雨為晴，變人為獸，幻作獅、象、虎、狼等物，又能使荒胎之婦，喜慶弄璋？此中道理神奇，當別有妙法？麥君謂：「化行功用，為大造所操，人力區區，斷難幾及。外臣聰明有限，實不能知。」王顧左右，指麥君曰：「彼遠人吝教，恐朕不肯假舟也！然餽物遠臨，誠意殷渥，卿等當善體其情，借渠數艘，以慰遠人之望。」¹¹⁰

上述引文可見敘事多所轉折，處處機鋒。國王偏好陰陽術，向麥君討教「變雨為晴，變人為獸，幻作獅、象、虎、狼」的神秘術數，明顯與麥君的科學、宗教立

¹⁰⁹ Ibid., chapter XI, pp. 193-196.

¹¹⁰ 盧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3，頁15b-16a。

場背道而馳。麥君以「聰明有限，實不能知」，試圖脫困。國王窮追不捨，責難「遠人吝教」，在激化與衝突中，最終考量到對方誠意殷切而又回心轉意。如此的言談軼事展現個人風貌與事件奧妙，在激化與緩和的張力中，國王看似咄咄逼人實又通情達意，率真耿直的個性躍然紙上。

由上可見，譯者透過敘事想像，替施登萊原著添加枝節，拼湊各種具有張力、衝突或轉折的敘事片段。若就「片段拼湊」而言，以理性科學筆調為主的知識敘述，完全迥異於情感表達的抒情片段，而天馬行空的敘事想像，又對立於科學描述的知識敘述。各種片段愈是天差地別或矛盾對立，愈能展現彼時文人對於新舊體系並存不悖的訴求／追求，恰能反映晚清譯者不同於往後五四論者刻意將「現代」與「傳統」二分化的策略，新舊雜陳、兼容並蓄，反映其對於抒情、知識與敘事的追求。

五、接受視野：譯本？實錄？

在「採風問俗」的架構下，譯者刪除各種「尋找尼羅河」的蛛絲馬跡，卻一一串連起非洲各地的風土人情，確立「採風問俗」的新主旨。譯者又擷取新舊中西資源，層層拼湊各種有關抒情、啓蒙與敘事的片段。此「拆除—拼湊」的翻譯法讓後人無法辨識原貌，迄今尚未有任何論者確切提出《斐洲遊記》出處。本節將指出各論者如何因譯著的翻譯策略而出現特定的接受視野。

從一八八三年《三洲遊記》在《益聞錄》連載刊登，到一九〇〇年易名《斐洲遊記》結集出版，雖各附有具導言作用的〈小引〉與〈序〉，卻如前所述，遮蔽施登萊「尋找尼羅河源頭」之主旨，凸顯「採風問俗」的色彩，同時未能確切指出譯著的出處。這兩篇導言都錯失可幫譯著「正名」的契機，也奠定往後論者的接受眼光，大致往「採風問俗」的方向發展。一九〇二年，顧燮光(1875-1949)替徐維則(？-？)《東西學書錄》補輯《增版東西學書錄》時加上《斐洲遊記》條目：

《斐洲遊記》四卷，上海中西書室排印本。〔英〕施登萊著，滙報館譯，述洲內地方物產、民情甚詳，附圖若干幅，坊間刪改其書，名「三洲游記」，殊嫌割裂。(顧補)¹¹¹

¹¹¹ 〔清〕徐維則輯，顧燮光補：〈遊記第二十八〉，《增版東西學書錄》，收入〔清〕王

顧燮光接觸的是一九〇〇年匯報館出版的《斐洲遊記》版本，指出譯著由英人施登萊所著，乃是受到《斐洲遊記》之〈序〉中提及的「施，英人」所影響。施登萊實是美籍。論者指出「述洲內地方物產、民情甚詳」，未能道出原著「尋找尼羅河」之主旨，顯然是接受譯本「採風問俗」的翻譯視野。顧雖道出譯著缺失，如「坊間刪改其書」、「殊嫌割裂」，不過卻因未能掌控譯著確切出處而只能常理性指出譯本出現的刪改概況。往後大多論者沿著此一論述規範評論《斐洲遊記》，如謝國楨(1901-1982)《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指出：

《斐洲遊記》四卷，上海中西書室本，英人施登萊 Stanley 撰，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述……是本節譯《尋見李文司敦記》之文，惟杜撰人物事實，改施登萊為麥領事，假定遊記出華人手筆。原書面目全失，自有譯本以來竄改原書之甚，莫有逾於是本者也。¹¹²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比起《增版東西學書錄》更進一步指出《斐洲遊記》譯自《尋見李文司敦記》，乃是施登萊第一次到非洲尋找立溫斯敦的著作 *How I Found Livingstone*。事實上，如此觀點有誤，《斐洲遊記》實譯自施登萊的第二本著作《穿越黑暗大陸》。固然，類似「杜撰人物事實」、「改施登萊為麥領事」、「假定遊記出華人手筆」等批評並非無的放矢，可是因核對出處時出現失誤，必然放大其與原著的鴻溝，無法精準評估箇中異同，導致不盡公允的激烈批判：「自有譯本以來，竄亂原書之甚，莫有逾於是本者也。」若是核對《斐洲遊記》與《穿越黑暗大陸》，可發現譯本並非一味「杜撰人物事實」，卻也有諸多相應之處（詳見本文第三節）。

相對於文學評論界對於《斐洲遊記》不忠實於原著的批評，歷史學者對於《斐洲遊記》的接受視野恰好形成一強烈對比。長期研究非洲資料的艾周昌〈《三洲游記》初析——到東非內陸旅游的第一個中國人的紀實〉將《斐洲遊記》視為一珍貴的紀錄：「《三洲游記》給人們提供了當時東非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等等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對英、德占領前的坦桑尼亞、烏干達等國作了生動真實的描寫。」¹¹³ 如此評論顯然誤將譯著視為實錄，忽略《增版東西

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頁267。

¹¹² 橋川時雄等主編，王雲五等重編：《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頁2808。

¹¹³ 艾周昌：〈《三洲游記》初析——到東非內陸旅游的第一個中國人的紀實〉，《歷史教學問題》1989年第4期，頁59。

學書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早已指出該著作的翻譯屬性。一旦，論者將譯本內容當真，必然引發各種誤判，如將譯著虛構的人物丁廉視為真實的作者，「1877年以丹麥駐阿非利加領事麥西登文案的身份，隨游東非內陸」¹¹⁴。艾甚至將虛構人物「丁廉」當真，並勾勒其出身背景，如「廣東番禺人」、「少識西文」、「名醫理」，實是混淆第一人稱敘述與作者真實身分，以譯著虛構的人物身世反證作者身世：「（領事）知余明醫理，令為士兵醫治」、「余與麥領事仲和等漸摩日久，稍識西文，遂同麥領事繕寫文書」、「番禺丁雪田」¹¹⁵。艾將丁廉當成真實出訪非洲的中國人物，將此一往後不受到任何關注的「人物」與因探訪非洲而揚名萬里的立溫斯敦相比：

利文斯頓第一次探險回國後，皇家地理學會授予他金質勳章，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分別授予哲學博士學位，《南非傳教旅行與考察》一書風靡全國。他死後，遺體和遺物運回英國，葬於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研究他的生平的著作，不斷出版發行。丁廉等人到非洲旅行，幾乎在我們國內沒有引起注意，只有上海的一家報紙，說他們在非洲為野人所食，死於非命。巴仲和死於烏季季，在當時的中國，誰會想到為一個小知識分子歸葬家鄉奔走哩，甚至《寧波縣志》也未替這位第一批進入東非內陸的中國旅行家書上一筆，而那些做官的、節烈婦女是非要大書特書，立牌坊不可的。¹¹⁶

上述感慨喟嘆的引文，恰可見到論者深感不平而試圖開棺重審的意圖，可是卻混淆現實與虛構的界線，將虛構的內容當真，變為是替一位不曾存在的人物爭取歷史地位。關於上海報館報導丁廉等人在非洲「死於非命」，乃是取自譯文虛構的情節：中國新聞報館謠傳丁雪田等人「行抵阿洲迦尼地方，突遇野獅數十頭，從林中躍出，將從者五十名，嚙斃」，「報紙之不足信，於是可見一斑矣」¹¹⁷。論者陷入迷霧，最主要的癥結乃是將《斐洲遊記》虛實交錯的翻譯創作筆調當成一真實有據的傳記。

艾周昌之研究直接影響往後研究中非關係史的學者，紛紛以「實錄」看待《斐洲遊記》，如李安山〈20世紀中國的非洲研究〉指出「除了關於埃及的一些譯著之外，最早在中國出版的關於非洲的書籍很可能是英國人施登萊所著的

¹¹⁴ 同前註，頁 58。

¹¹⁵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 1，頁 20a；卷 4，頁 22a。

¹¹⁶ 艾周昌：〈《三洲游記》初析——到東非內陸旅遊的第一個中國人的紀實〉，頁 61。

¹¹⁷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斐洲遊記》，卷 4，頁 22a。

《斐洲遊記》(1900)」¹¹⁸。彭坤元〈清代人眼中的非洲〉指出「丁廉撰寫的《三洲游記》(1878年)是從微觀角度記述作者親身游歷東非內陸的所見所聞」，高度肯定其史料價值：「對蘇庫馬地區農村的公社制度，對木塢發生的部落之間的戰爭，對卡拉圭王宮和宮廷禮儀，對基塔拉酋長的相貌和穿著打扮，以及對卡拉圭國王嗜酒和酒後的醉態，都有十分生動、細緻的描寫。」¹¹⁹事實上，上述內容出自譯者的「片段拼湊」：關於蘇庫馬地區農村的公社制度乃是取自施登萊的《穿越黑暗大陸》提及的 Usmau 地區的現象，而「卡拉圭王宮和宮廷禮儀」、「卡拉圭國王嗜酒和酒後的醉態」則是拼湊《益聞錄》第六十二號到六十四號的〈野族紀聞〉一文，渲染晚清人士中的「野族」形象¹²⁰。譯者拼湊不同脈絡的文章，無疑讓後人難以辨識其原貌，若非長時間追蹤，恐怕無法釐清箇中虛實交錯的成分。不過，彭坤元卻在誤判中意外貼近施登萊原著「尋找尼羅河」的主旨：

從桑給巴爾島啓程，越海至巴加莫約，由此往西，沿著歷史上形成的販運象牙和奴隸的商道，途經戈戈人居住區、多多馬，轉向西此，走過辛吉達和蘇庫馬人地區，之後乘船沿維多利亞湖西岸北上，進入布尼奧羅和布干達境內，最後折向南穿過米蘭博國王統轄地區，抵達坦噶尼喀湖東岸的烏及及。整個行程兩千多公里，歷時一年半。這條路線止于布干達的這一段很可能是英國探險家斯皮克 1860-1862 年考察尼羅河源頭時走過的。¹²¹

彭坤元靠著地理路線推論該條路線乃是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初史畢克考察尼羅河的路線，彰顯《斐洲遊記》有意遮蔽得原著主旨，讓「尋找尼羅河」又浮上水面。論者確實某種程度判斷出相關路線是探索尼羅河之路線，可是離原著出處仍有一段距離，誤以為是中國人沿著史畢克尋找尼羅河的路線所寫出來的實錄，實是翻譯施登萊尋找尼羅河的傳記。

當代年輕學者張治〈《三洲游記》小考〉已能糾正前輩的若干偏失，如指出艾周昌的「實錄」偏誤，且又在《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所提的「譯著」觀點上更進一步指出該著作乃是「通過多種間接資料組合嫁接，把西人的旅行文章移植在

¹¹⁸ 李安山：〈20世紀中國的非洲研究〉，《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頁110。

¹¹⁹ 彭坤元：〈清代人眼中的非洲〉，《西亞非洲》2000年第1期，頁61。

¹²⁰ 佚名：〈野族紀聞〉，《益聞錄》，第62號，頁190；第63號（1880年8月21日），頁196；第64期（1880年8月28日），頁202-203。

¹²¹ 彭坤元：〈清代人眼中的非洲〉，頁61。

華人身上」¹²²，「反映 19 世紀 60 年代以後參與報刊筆務的中國文人一方面對於西學懷有興趣，一面卻又保持傳統文學的寫作愛好，使得該時期的報刊文章呈現文學性與新聞性的兩個維度」¹²³，更進一步深化研究視野。只是，論者受限於《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提出的譯著出處，導致一根本性的失誤：

斯坦利曾經把如何發現列文斯敦的探險過程寫成一書，名為 *How I Found Livingstone*，即《續修四庫提要》中所說的《尋見李文司敦記》，凡 16 章，附多幅地圖……還有書中人名也有相似者，斯坦利所雇傭的翻譯名叫 Selim，而《三洲游記》中所請的「通事」亦名色勒。¹²⁴

由於未能核對正確的版本，重蹈覆轍，將《斐洲遊記》視為施登萊第一本非洲傳記的譯本，除難釐清原著與譯者的異同外，也無法深入論述，當中不免穿鑿附會，如將譯本の色勒視為施登萊第一本傳記中的 Selim，「色勒」實為譯者虛構的人物。孫瀟〈《益聞錄》編輯傳播策略探析〉援引張治觀點，指出「該文改編自亨利·斯坦利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 發現大衛·列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的探險過程，書名為 *How I Found Livingstone*」¹²⁵。這些觀點實受到《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的影響，輕易將《斐洲遊記》導引以尋找立溫斯敦為主旨的《我如何尋找立溫斯敦》，而非以尋找尼羅河源頭為主旨的《穿越黑暗大陸》，蔚為特殊的接受視野。

由上可見，《斐洲遊記》「拆除主幹」與「拼湊片段」的翻譯方式，導致往後論者或是混淆「翻譯」與「實錄」的界線，或是誤解譯本出處，讓百年以降的接受者處於迷霧之中。雖然如此，相關評論仍有其必要，在普遍不重視的「非洲」的評論語境中，這些研究無疑喚起學界的注意，雖然有所侷限，卻已能在「誤讀」中推進論點。本文便是奠基於如此曲折的接受視野，透過各種資料的解讀與探究，試圖將《斐洲遊記》研究推到另一里程碑。

¹²² 張治：〈《三洲游記》小考〉，《蝸耕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40。

¹²³ 張治：〈「引小說入游記」：《三洲游記》的邊譯與偽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 年第 1 期，頁 150。

¹²⁴ 張治：〈《三洲游記》小考〉，頁 40。

¹²⁵ 孫瀟、衛玲：〈《益聞錄》編輯傳播策略探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0 卷第 6 期（2010 年 11 月），頁 62。

六、結語

在學界普遍未能注意與掌控《斐洲遊記》的情況下，本文勾勒譯本的出版脈絡、譯者身分與版本流變，比較譯著與原著之異同與分析譯者的翻譯手法，試圖釐清十九世紀的晚清譯者對於施登萊非洲傳記的翻譯與傳播概況。如此研究取徑，可以擴大目前學界相對著重於晚清作者有關歐、美、日之書寫或翻譯，提供另一可能，填補研究空白。

施登萊《穿越黑暗大陸》考掘尼羅河的確切源頭，核對史畢克、博頓、巴克、立溫斯敦等前驅者提出的維多利亞湖、艾伯特湖、坦噶尼喀湖與盧拉巴河等，涉及高度專業的學理判斷與錯綜複雜的地理問題，恐非晚清讀者或譯者所能掌控。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虛構中國人物丁雪田的視角，重新演述施登萊的原著內容，刪除作為原著主幹的「尋找尼羅河源頭」，彰顯施登萊在探索尼羅河過程中所記載的風土民情、社會形態、集市交易、非洲人體、庶民生活與宮廷文化等，遂使得譯著主旨產生變化，變為更能符合自身視域的「採風問俗」。

除「刪除主幹」導致主旨轉變外，譯者亦透過「拼湊片段」的方式，將自身的需求或訴求，導入譯著。譯者如「修補匠」般調動／剪接／並置其觸手可及的資源，從渲染情感的詩詞片段、傳播新知的新聞內容，到搬演敘事想像的小說書寫，改寫原著內涵，恰能反映十九世紀八〇年代譯者共存的多層旨趣。首先，《斐洲遊記》疊入日記、詩詞與書信等內容，彰顯中國文人面向世界時的內心圖景，將原著有意訴諸的理性、客觀、科學與技術等視角，導入中國文人更關注的情感紋路如遊子情懷、吟詩賞月與登高望遠等情懷；其次，譯著拼湊以議論說明為主的報刊文章，在翻譯創作中揭開海外見聞、器物發明、部落族群等，講究實證依據與科學基礎，側重現代知識與公共內容；第三，譯者以虛實交錯的敘事想像，繞出報刊文章的新聞視角與理性口吻，透過場景、人物、言行、形象等方式搬演各種情節，使得想像與徵實、敘事與現實等層層糾葛，混亂駁雜，不無矛盾。這種將詩詞、新聞、史地、翻譯與小說等參差不齊的元素混為一爐的翻譯創作，恰能表達譯者對於抒情、知識與敘事的追求。

固然，《斐洲遊記》不忠實於原著，可是其意義遠超過作為一譯本的範疇。一譯本猶如一價值世界的折射，譯者重編與改寫施登萊原著，拆除主幹、拼湊片段，按照自身的視域，選擇性保留／刪除原著內容，纏繞各種質素與內涵，在無

限廣袤的天地中縱橫蔓延，時而返回古代靈魂攝取養分，時而面向當代西學汲取資源，延展出一條條交錯的軌道，折射新舊 / 中西 / 古今等相疊映的視野。

拆除主幹，拼湊片段

——論《斐洲遊記》對於施登萊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的重構

顏健富

一八七四年，《紐約先驅報》記者施登萊深入非洲內陸尋找尼羅河源頭，寫成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穿越黑暗大陸》）。該書中譯本《三洲遊記》自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八年連載於《益聞錄》，一九〇〇年由《匯報》館出版單行本時易名《斐洲遊記》，成為中國較早的非洲傳記譯本，勾勒非洲內陸歷史地理與風土民俗，反映彼時作者在歐、美、日等參照視野中開拓「非洲」新天地的意圖。本文先勾勒此一譯本如何在上海文化界發生的脈絡，且釐清譯者身分與版本差異。接而，就翻譯而言，《斐洲遊記》比起二十世紀初的各種「意譯」著作，出現更大的轉向幅度。譯者按照自身的視域，選擇性保留／刪除原著內容，又加入中國文學傳統與西方現代知識。本文提出「拆除主幹，拼湊片段」的詮釋架構，展現十九世紀末中國譯著的翻譯手法。就「拆除主幹」而言，觀察譯者如何虛構人物視角，重新演述，刪除／凸顯特定內容，使得「尋找尼羅河源頭」的主旨變為更符合譯者接受視野的「採風問俗」？就「拼湊片段」而言，討論譯者如何逸出原著範圍，層層錯疊不同脈絡的片段內容，表達晚清文人對於抒情、知識與敘事的追求？如此研究，將可反映晚清譯者對於彼時「非洲傳記」此一新鮮題材的翻譯與接受方式，豐富晚清文學的研究視野。

關鍵詞：施登萊 立溫斯敦 非洲 翻譯 晚清

Dismantling the Backbone, Putting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Translating Henry Stanley's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into Chinese

GUAN Kean Fung

In 1874, Henry Stanley, a reporter for the *New York Herald*, traveled to Africa in search of the sources of the Nile River, an experience that he would later recount in his bestselling work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1878). Between 1883 and 1888,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entitled *Travels in Three Continents*, was published in serial format in the *Yi Wen Lu*, a publication of the Shanghai Church. The *Huibao* publishing company also issued a translation of the work in book form in 1900, this time with the title *African Travels*. Stanley's work is one of the earliest books on Africa translated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depicts the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stoms of that continent, and contrasts the wide-open vistas of Africa with the more confined spaces that the author had encountered in Europe, America, and Japan. The present study begins by describing how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came to be published in Shanghai. It also looks at the lives of the various translators of the work, and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It then shows that even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translations that appear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n Travels* was a relatively "fre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s changed the source text as they saw fit, at times adding new bits of information having to do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r modern Western knowledge. In the view of this paper, this translation style can be described as "dismantling the backbone of the text, and putting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As far as "dismantling the backbone" is concerned, this paper notes how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nvented a new point of view for the narrator, and how the original theme of searching for the sources of the Nile was replaced in the translation by a description of the habits and customs of various African peoples. As to "putting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he translators escaped the confines of the source text to add new information that was of interest to its intended reader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an enlarge the scope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Keywords: Henry Stanley David Livingstone Africa translation
late Qing dynasty

徵引書目

- 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王韜：〈探地記〉，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
- 、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艾周昌：〈《三洲游記》初析——到東非內陸旅游的第一個中國人的紀實〉，《歷史教學問題》1989年第4期，頁58-61。
- 佚名：〈益聞錄弁言〉，《益聞錄》第1號，1879年3月16日，頁1。
- ：〈野族紀聞〉，《益聞錄》，第62號，1880年8月14日，頁190；第63號，1880年8月21日，頁196；第64號，1880年8月28日，頁202-203。
- ：〈三洲遊記小引〉，《益聞錄》第278號，1883年8月4日，頁352-353。
- ：〈評林〉，《小說林》第9期，1908年2月，頁9-14。
- 李安山：〈20世紀中國的非洲研究〉，《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頁108-129。
- 李杅：〈序〉，收入龔柴：《五洲圖考》，上海：徐家匯印書館，1898年。
- 李維·史特勞斯著，李幼蒸譯：《野性的思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 李歐梵：〈帝制末的文學：重探晚清文學——在常熟理工學院「東吳講堂」的講演〉，《東吳學術》2011年第4期，頁44-50。
- 沈定年：〈序〉，收入立溫斯敦著，史錦鏞譯語，沈定年述文，陳以真校字：《黑蠻風土記》，出版地、出版單位不詳，1879年，首爾：奎章閣藏。
- 孟兆臣：《中國近代小報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 孫瀟、衛玲：〈《益聞錄》編輯傳播策略探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6期，2010年11月，頁60-65。
- 〈追悼龔右愚司鐸〉，《善導月報》1914年第12期，頁16。
- 海門放眼遠觀人：〈古愚龔公小傳〉，《聖教雜誌》第4卷第2期，1915年2月，頁66-67。
- 張治：〈「引小說入游記」：《三洲游記》的逐譯與偽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1期，頁150-162。
- ：《蝸耕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 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年—1916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彭坤元：〈清代人眼中的非洲〉，《西亞非洲》2000年第1期，頁60-62。
- 曾經滄海：〈遊美國紐約大醫院記〉，《益聞錄》第47號，1880年5月2日，頁100。

- _____：〈遊美國啞人院〉，《益聞錄》第 62 號，1880 年 8 月 14 日，頁 190-191。
- _____：〈遊雪加古大學院記〉、〈估計巨工〉、〈照影愈奇〉、〈英鑄大炮〉，《益聞錄》第 83 號，1881 年 1 月 8 日，頁 11-12。
- 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錄：《三洲遊記》，《益聞錄》第 278 號，1883 年 8 月 4 日，頁 353；第 280 號，1883 年 8 月 11 日，頁 365；第 319 號，1883 年 12 月 26 日，頁 559。
- _____：《續錄三洲遊記》，《益聞錄》第 281 號，1883 年 8 月 15 日，頁 270，第 313 號，1883 年 12 月 5 日，頁 563；第 319 號，1883 年 12 月 26 日，頁 599；第 350 號，1884 年 4 月 19 日，頁 178；第 553 號，1886 年 4 月 21 日，頁 173；第 613 號，1886 年 11 月 17 日，頁 533；第 618 號，1886 年 12 月 4 日，頁 562。
- _____：《斐洲遊記》，上海：上海中西書室，1900 年。
- 梁溪瀟湘館侍者輯：《春江花史》，上海：二石軒，1884 年。
- 樽本照雄編，賀偉譯：《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
- 橋川時雄等主編，王雲五等重編：《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
- 錢琬薇：《失落與緬懷：鄒弢及其《海上塵天影》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 鄒弢著，王海洋校點：《澆愁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 年。
- 譚帆：《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54 年。
- 龔柴：《地輿圖考》，上海：益聞館，1883 年。
- Ercolino, Stefano. "Length." In *The Maximalist Novel: From Thomas Pynchon's Gravity's Rainbow to Roberto Bolaño's 2666*.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 Moretti, Franco. *Modern Epic: 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 to García Márquez*. New York & London: Verso, 1996.
- Stanley, Henry M. "Introductory." In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Travels, 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 Including an Account of Four Months' Residence with Dr. Livingston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2.
- _____.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London: George Newnes, 1899.
- Wilson, Arthur. *The Living Rock: The Story of Metals since Earliest Times and Their Impact o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Woodhead Publishing Limited, 1994.